

The FROGBEAR project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funding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道教与元明清东镇庙的日常运作 ——以东镇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白照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

岳镇海渎观念和祭祀，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和政治现象。有关这一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¹作为岳镇海渎组成部分的东镇沂山，在国家祭祀和地方传统中占据颇为重要的位置。宋代之后的东镇庙位于今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沂山山麓，作为岳镇海渎之一的沂山东镇庙自隋代开始就是重要的国家祭祀场所。²既然是国家祠祀，便主要承担官方礼仪祭祀功能，在道理上讲应有官方负责一应日常工作。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出，金元以降道教对国家镇山庙宇的维系居功至伟，有关元代北岳庙、中岳庙、南镇庙，甚至泰山岳庙的研究，均反映出道士在维系这些国家祠庙日常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³同时诸如明代神乐观道士在内的道教机构对朝廷祭祀礼制的影响也已获得学界关注。⁴元以降的东镇庙呈现出类似

¹ 相关总结及最近研究，参 Jia Jinhua.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Ritual System of Sacrifice to Mountain and Water Sprits. *Religions* 12 (2021), 1-15.

² 有关中国古代镇山系统的形成过程，参张目：《古代国家镇山祭祀格局初探》，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梁勇：《镇庙建筑与祭祀研究》，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

³ 森田宪司：《元朝における代祀について》，《东方宗教》2001年第98卷，第17-32页；樱井智美：《元代の北岳庙祭祀とその遂行者たち》，收气贺泽保规编：《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社会——北朝隋唐を中心に》，汲古书院2007年版，第113-142页；周郢：《全真道与蒙元时期的五岳祀典》，收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2页；马晓琳：《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5-16页；刘江：《元代全真道的岳渎代祀》，《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7第1期，第77-79页；张琰：《泰山全真道与元代东岳祭祀》，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3辑，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167-188页；林巧薇：《试论嵩山中岳庙与宋以后国家祭祀礼制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第105-111页；等。

⁴ 参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第32-42页。明初神乐观道士致祭岳镇海渎现象并不罕见，例见许芳：《中镇霍山信仰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1页。就东镇庙而言，也有洪武二十八年（1395）神乐观道士诸不溪代祀等不少案例，见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16，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288

现象——官方将东镇庙作为重要的祭祀场所，但却将东镇庙的日常打理和维持工作交给“守庙道士”负责。

有关东镇的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不少成果，包括专题论著、毕业论文和地方文史通俗读物在内的成果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彻底忽视东镇庙中的道教因素，但绝大多数的讨论却都将关注点放在朝廷的礼仪制度和祭祀实践方面，⁵而将东镇道士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的成果依旧非常罕见。⁶与此同时，最晚从元代开始东镇庙已为全真教团体所占据。有关山东全真道的研究也不时提及东镇道教，但由于主题不同而导致这些研究对东镇道教的探讨难以深入。⁷故有关东镇道教的相关问题，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和探索价值。

导致东镇道教研究相对薄弱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料太过零散。目前所见专门记述东镇情况的材料只有《东镇沂山志》，但其中对道教情况的记载却极为破碎。其他明清时期临朐、青州、山东方志，对东镇道教的记载也没有太大起色。另一部据传为明末清初东镇住持赵守身所著的《东镇述遗记札》，秘藏于私人之手，外人难得一见。故对于东镇道教的研究，需求助于一般传世文献之外的材料才能获得转机。近年沂山石刻的整理工作为东镇道教的研究带来福音，赵卫东及当地专家分别整理出数部系统呈现沂山碑刻（尤其道教碑刻）的著作，使对东镇道教历史的进一步挖掘成为可能。⁸东镇庙中碑石林立的情况数百年前已引起当地人士关注，明代傅国（1581?—1644年）《昌国榦榘》记载称：“山之东谷中为东镇庙，其历代敕告祀文俱勒石祠下，及古今游人题咏多坎壁间。”⁹今日所见东镇碑刻以元明清石刻为主，据信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时东镇庙中有古碑360余座，此后因人事不断损毁，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东镇庙修复时复立85座，又得残碑数十块，现存古碑约145幢。¹⁰尽管现存东

页；又见本文附表1。

⁵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2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74-289页；马晓琳：《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31-144页；郭明明：《明代沂山信仰》，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30-41页；孔维京：《金代岳镇海渎祭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等。

⁶ 目前仅见者为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2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74-289页。

⁷ 此类研究数量不少，其中以赵芑《山东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最为典型。有关山东全真道的丰富研究可为理解东镇庙道教情况建立宗教史背景。海内外对山东全真道的研究非常丰富，参秦国帅：《山东全真教的教团规模、分枝岔派与地域分布（1368-1949）》，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3辑，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188-189页。

⁸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

⁹ 傅国：《昌国榦榘》，卷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0页。

¹⁰ 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张敬华、王萱：《东镇庙碑林石刻档案》，《山东档案》2001年第4期，第41-42页。

镇碑刻尚不及已知的东镇碑目半数，¹¹但相较于其他传世材料，仍能揭示历史上东镇道教的一些情况。本文以现存东镇碑刻为中心，结合方志、正史、金石著作等材料，尝试对元明清东镇庙道士的基本情况，及其在东镇庙历代修造工程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希望能有所发现。

一、碑铭所见东镇庙道教整体情况

正如前文所述，能够反映东镇庙道士情况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1、方志；2、东镇庙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3、与东镇庙有关的各类碑刻。青州、临朐、山东等地方志材料中有关东镇庙道士的记载非常零散，甚至没有一位东镇庙道士传记得以保存，故仅能作为辅助性资料使用。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文献，但这部著作目前仅有的一件抄本保存在私人手中，¹²暂时仅能从当地专家文章中辗转获悉《东镇述遗记札》内容。此书“秘传”，且其本身尚未经过学术检讨，书籍性质仍有待确定。因是之故，本文对于这本书的参考（即使是少量的二手引文）采取最保守的方式。¹³尽管记述依旧颇为零散和简略，但东镇碑刻对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依旧是最有价值的材料。有关东镇碑刻所反映的东镇道士情况，赵卫东等学者曾做过深入研究，具有较高启发性。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元明清东镇道士群体的大致变迁脉络做以整体梳理。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沂山东镇庙以道士管理日常事务的现象开始于金代。梁勇依据《续通志》《宋史》《职官分纪》的记载指出，宋代岳镇海渚设庙令、庙丞等职，由当县县令（或年老州官）、县尉兼任，负责日常祭祀和管理工作。最晚至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开始，岳镇海渚庙宇改为道士主管。¹⁴赵磊近来对唐宋时期“岳渚庙令”做以细致研究，梳理出相关制度、庙令薪俸、职责等主要信息，¹⁵使我们确定宋代东镇庙中不应存在稳定的道士群体。一些学者以宋代的《沂山设醮碑》为依据，认为东镇庙自宋代开始可能就由道士管理，

¹¹ 已知东镇庙碑目，见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8-432 页。

¹² 据赵卫东所述，临朐县政协文史委员吉星田曾拥有该书。吉星田去世后，此书为其家人收藏，秘不示人。见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 辑，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303 页，注 1。吉星田本人多次引用书中内容，《东镇沂山》《沂山石刻》等当地文史著作亦见引及。笔者以三部当地学者著作为依据，以“辑佚”的方式整理出《东镇述遗记札》的部分内容并对之做以简要讨论，见本文附录。

¹³ 吉星田：《临朐县佛教、道教兴衰述略》，收政协临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1993 年版，第 147-161 页。需要指出的是，从临朐当地学者给出的《东镇述遗记札》引文来看，这部书是事实、传说、想象交织而成的奇特著作，很多叙述并不可信。

¹⁴ 梁勇：《镇庙建筑与祭祀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第 50 页。

¹⁵ 赵磊：《唐宋时期岳镇海渚管理研究——以“庙令”为中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 期，第 51-55 页。

¹⁶但此论似不易成立。《沂山设醮碑》碑文及石刻均已不存，此碑在《山左金石志》中著录为《张从训东安庙设醮记》，记述庆历六年（1046年）张从训奉旨于东镇庙设醮禳登州地震一事。¹⁷《光绪临朐县志》著录此碑为“道士吴太昭书”。¹⁸有道士参与的“醮”祭确实有可能属于道教传统，但仅从这些记载无法得出吴太昭是东镇庙道士的判断，更不能据此判定宋时东镇庙已由道士负责日常工作。如梁勇所述，金代转由道士管理岳镇海渎庙起源于中岳庙的一场避免地方小吏借机盘剥祈福民众的改革。大定十三年，“嵩山中岳祈依旧令本处崇福宫道士看守”，得到的回应是可以选择“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此制度继而铺展开来：

契勘岳镇海渎系官为致祭祠庙，合依准中岳庙体例，委所隶州府选有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仍令本地八官员常切提控。¹⁹

根据此则材料看来，金大定十三年规定的岳镇海渎庙负责道士的人数是二人，但这一数字可能很快就因事务超载而获准扩充。《大金集礼》记载东岳庙在大定十九年（1179年）即“后蒙批降，仰设道士十人勾管，如本处数少，于附近州府县分选取，满替依旧”。²⁰《大金集礼》中有中岳庙和东岳庙道士的情况存在一个细节差异值得注意，即旧时中岳庙是由位于嵩山山麓的崇福宫道士托管，而东岳庙有关的新规定则似乎是改为选择十位高道隶属此庙，专门负责管理工作。从“托管”到“专管”的转化，可能也发生在东镇庙上（详见下文）。大定之后，沂山东镇庙已属道士管辖，杨道全即最初的东镇道士之一。《金史》记载，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四镇、四渎为王。²¹元至治二年（1322年）《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庙神佑宫记》（后简称《神佑宫记》）作者酈道顺节录东镇庙“大安故碑”中涉及东镇庙田四至的内容，记为“知庙道士传度师杨道全立石”。²²考大安三年（1211年）间曾立《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明列东镇庙专属山场禁百姓樵采云云，当即杨道全所立之碑。根据本文附表1“现存元明清东镇庙碑刻中的道士名录”可知，元明清三朝均承金制，东镇庙一直委托道士负责日常事宜。以下依托附表统计及其他相关材料，对东镇庙道士基本情况做以分析。

1、东镇庙道众规模

由于缺少整体性的描述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有关东镇庙道士在元明清不同时期的规模不可能得出非常明确的答案。但一些东镇碑刻中的道众题名和方志对东镇庙道士居住空间

¹⁶ 如郭明明：《明代沂山信仰》，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50页。

¹⁷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16，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1988年版，册19，第14619a页。

¹⁸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9之下，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76页。

¹⁹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卷34，第337页。

²⁰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卷34，第337页。

²¹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34，第810页。

²² 酈道顺：《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页。

的记载,或许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刊刻道士题名数量较多的东镇碑刻主要有至治二年(1322年)《神佑宫记碑》、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以下逐一分析。

神佑宫是元代在东镇庙内专门兴建的道教建筑,《神佑宫记》记载了这座宫观的建造始末。²³有关这方碑刻及神佑宫的修造,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者,《神佑宫记》碑阴题名中出现的多数道士并非神佑宫或东镇庙道士,而是隶属于青州太虚宫或益都路道录司的道士;二者,碑阴题刻中存在一些残泐现象,导致无法确定部分道士题名是否属于东镇庙道士。但有理由相信的是,东镇庙道士均有参与此次道观修造活动、获得题名的机会。因此,似乎将此碑现存题名中带有“本宫”、“本庙”、“东镇”、“神佑宫”的道士均判定为“东镇道士”,便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有效的统计数字。然而,笔者非常怀疑,这里的“本宫”并不指神佑宫,而是指太虚宫,这一点从唐志迁身上即可看出端倪。《神佑宫记》正文记载唐志迁以“太虚宫提点”的身份主持神佑宫修造事宜,碑阴题名中称其为“中玄妙义大师本宫提点唐志迁”,此处之本宫显然是指太虚宫。赵卫东依据《神佑宫记》内容判定唐志迁担任东镇庙提点,²⁴可能还可讨论。《神佑宫记》确实记载唐志迁管理神佑宫修造,但并未说他担任东镇庙提点,而始终称其为“太虚宫提点”。这一现象有可能反映元代东镇庙在管辖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有关于此,容稍后再做讨论。《神佑宫记》碑阴题名中还有一例比较特殊,即“明贞大师知东镇庙事本宫口张口”。此题名残缺两字,从现有文字推测此人确实既是太虚宫道士,但又被派来参与东镇庙的管理事务。如果舍去碑刻中的“本宫”道士,则《神佑宫记》正文和题名中所给出的专属东镇庙的道士,只有梅道隐、张德显、王道融、“明贞大师”、刘道源、李道成数人。

神佑宫的建立有利于东镇道众的扩充,道房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道士数量的标准之一。明代傅国《昌国觶》称东镇庙中有“道房七十余间”,²⁵明代王居易的《东镇沂山志》也记载称“道士居室共七十间”,²⁶显示明代东镇庙最少具备容纳数十位道士的条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中的道士题名给出了更具统计价值的明代道士数字。²⁷这方重修碑铭给出3位住持和33位“本庙道士”的题名。尽管严格意义上讲36这个数字只能代表东镇庙道士数量的下限,但此次重修为民间主导行为,又涉及东镇庙

²³ 郦道顺:《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页。

²⁴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2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85页。

²⁵ 傅国:《昌国觶》,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26页。

²⁶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24页。

²⁷ 赵秉忠:《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8页。

全体道众切身利益，或可推测这个名单实际囊括当时所有（至少大多数）的东镇道士。康熙二年（1663年）年的《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与前者类似，此次重修活动东镇庙道众肩负募化之责，推测碑记最末题名可能也涵盖东镇庙所有道士（9人）。但有一特殊现象值得注意，碑文提及重修活动中道众内部产生矛盾，曹真惟、石冲月、石冲明三人隐匿石灰受到谴责，此三人未出现在碑刻最后的题名中。二者相加，此时东镇庙最少有12位道士。如果康熙二年《重修东镇庙落成记》给出的题名就是东镇道士的总数或涵盖大多数东镇道士，那么便可发现明末到清初重修之前东镇道士数量有明显的缩减趋势。秦国帅有关山东全真道分布的研究，发现乾隆初年黄册记载的山东府县僧道统计数据，其中临朐县全真道士共计16位。²⁸显然，这16位全真道中包含着东镇庙的全部正规道众。除以上碑记外，晚清和民国临朐方志显示东镇庙日渐荒颓，庙中道士居所数量锐减，东镇庙道士数量大幅下降。《光绪临朐县志》记载当时东镇庙已破败不堪，“公所、道房各三间，瓴甑不具，荫以重茅。”²⁹此后在地方官府不作为和地方匪乱昌盛的背景中，东镇庙情况更是江河日下，至民国时期“庙宇日荒颓矣”，³⁰道士似乎也只剩下张礼修、侯智深而已。³¹

根据以上讨论，大致可给出如下判断：东镇庙在金代开始由道士管理，庙中最初只有两位道士，但可能很快便开始扩充。元代东镇庙神佑宫建立，东镇庙道士人数快速增长，至明万历年间东镇庙最少有36位道士。清代开始东镇庙道士总数不断减少，乾隆初年时东镇庙正规道士人数上限是16位，至光绪时期恐怕只有数人（依“道房三间”判断），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时只余两人。以上有关东镇庙道士人数的推定无法涵盖“道童”等尚未获得正式道士身份的人等，所得数字偏向保守，但道众规模的明显起伏亦足以揭示东镇庙在历史上兴衰大势。

2、东镇庙道士宗派归属及与地方道司关系

赵卫东的一项研究，关注东镇庙道士题名（尤其有师徒关系者，如《唐教玉墓碑》和《赵守身墓碑》的记述），将道士姓名与《诸真宗派总簿》等材料记载之全真道字派进行对比，并联系全真道传布范围的时空变化，认为元代东镇庙道士确属全真道，但具体派系不明；自嘉靖末开始，东镇庙中明显存在华山派和丘祖又派两派全真道士，其中丘祖又派为华山派道士唐教玉所创，两派法脉一同居于东镇庙中。³²赵卫东的以上判断当可依从，此无必要重复

²⁸ 秦国帅：《山东全真教的教团规模、分枝岔派与地域分布（1368-1949）》，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3辑，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193页。需要注意的是，庙宇中存在“不在编”道士的情况，这些确实存在的修道者未必被登记在册。

²⁹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5，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³⁰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15，见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页。

³¹ 李焕章：《民国二十九年重修寝殿碑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31页。

³²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2辑，齐鲁书社

论述。

金代东镇庙道士是否全真道不易确定，根据前述东镇道士杨道全被称为“传度师”的情况来看，其更可能是“正一道士”。以此而论，全真道入主东镇庙的情况，发生时间可能要更晚一些。根据目前所见材料，有理由怀疑全真道入主东镇庙起源于元代，且与当时东镇庙的“托管”存在关联。前述元至治二年（1322年）《神佑宫记》信息丰富，值得关注。碑记的作者为“本宫上院太虚延寿宫玄坛提举”酈道顺，根据碑文记述，梅道隐曾任东镇庙提点，元大德二年（1298年）朝廷遣使致祭东镇后，梅道隐受命“选保到太虚宫”，此时“提点张德显可知本庙事”。³³次年，掌教大真人下命，正式任命张德显“充东镇沂山神佑宫提点勾当，知元德东安王庙事”。从“提点张德显可知本庙事”的用语，可判断张德显原本应当就是东镇庙中的一名“提点”。张德显在任期间，积极兴建神佑宫，但不久去世，由“太虚宫提点唐志迁摄管其事”，完成修造工程。曾担任东镇提点的梅道隐在去往太虚宫后，“官运亨通”，于“至大二年己酉（1309年）、延佑三年丙辰（1316年），两经宣授真静纯德大师、本路都道录、东镇、太虚宫提点，经今积有其年”。梅道隐在大德二年转任太虚宫提点后似乎在某个时间再次担任东镇庙提点，如元皇庆二年（1313年）《脱欢、蔡文渊昭告碑》中即有“东镇提点梅道隐”的题名。³⁴接着，酈道顺为神佑宫的修造表达敬意，在接下来的题名中，出现大量“本宫”（太虚宫）道士。正如赵卫东所述，这方碑刻展现出神佑宫、太虚宫、东镇庙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其有关东镇庙是太虚宫“下院”的观点或许还可商榷。³⁵有关东镇庙是太虚宫下院的观点，系从碑文作者自称“本宫上院太虚延寿宫玄坛提举”酈道顺得来。但这一判断道理不畅，且无任何材料称东镇庙或神佑宫为“下院”，恐推求过度。本人怀疑太虚宫与东镇庙和神佑宫之间，更可能是道官制度上的“上下级”关系，而这又涉及到东镇庙道士的“独立性”问题。

简单而言，我怀疑元代益都路道录司设在太虚宫。《神佑宫记》中提及的太虚宫，赵卫东已经做过讨论，指出其就是青州城内的太虚宫。³⁶有关太虚宫的情况，青州地方资料多有记载，内容较为一致。元代于钦《齐乘》指出普照寺位于府署东北隅美政坊，而太虚宫则位于普照寺之南，是益都知府将自家馆舍施舍给丘处机而建立的道观。³⁷但正如赵卫东指出的

2011年版，第274-289页。

³³ 此句赵卫东等人断为“道录梅公，依奉御史台官之命，选保到太虚宫提点，张德显可知本庙事”，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页。笔者认为此句当标点为“道录梅公，依奉御史台官之命，选保到太虚宫，提点张德显可知本庙事。”断句不同对文意理解有一定影响。

³⁴ 《脱欢、蔡文渊昭告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6页。

³⁵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2辑，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85页；《昊天宫的创立及其宗派传承》，《宗教学研究》2014年4期，第3页。

³⁶ 赵卫东：《昊天宫的创立及其宗派传承》，《宗教学研究》2014年4期，第3页。

³⁷ 于钦：《齐乘》，卷4，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版，册

那样，更具史料意义的《清虚纯德辅教真人祠堂记》指出，丘处机修道的太虚宫是“栖霞太虚宫”（位于今烟台），益都路太虚宫则是丘处机弟子范全生购买知府徐氏馆舍建立的道观。³⁸由于范全生与栖霞太虚宫的深厚因缘，导致两所太虚宫之间很可能形成“上下院”关系。《齐乘》等当地方志在介绍青州寺观时太虚宫往往作为道观中的第一所出现，推测太虚宫至少在元代曾是益都路道教中心之一。根据元代道教管理制度规定来看，自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时开始，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形成定制。³⁹益都路道录司的所在缺少直接记载，本人之所以怀疑太虚宫即益都路道录司的根据如下：

- 1、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梅道隐仅担任过东镇庙和太虚宫两庙提点，但他同时又是“益都路都道录”，拥有总领益都路道录的权力和义务，依理当为道录司所在宫观道士。毫无疑问，益都路道录司所在绝非东镇庙，于是唯一选项即太虚宫。
- 2、《神佑宫记》记载梅道隐从东镇庙选保太虚宫，是奉“御史台官之命”，而张德显知东镇庙事则只需全真道掌教大真人降札。任命机构的差异，显示梅道隐改属太虚宫是去担任具有一定官方地位的“道官”，推测太虚宫应当是道官所在之宫观。
- 3、根据附表1所列道士名录可知，明初一段时间内，陪同官员致祭东镇的地方道士主要是临朐县道会司道士。稍早的洪武二年（1369年）致祭东镇时，则是太虚宫道士陪祭。⁴⁰事实上，表格中所列元代《伽八徵残碑》中的“宣道和”在至正八年（1271年）《东镇时享之记》和至正十年（1273年）的《代祀东镇记》中也曾现身，身份也都是“太虚宫提点”。⁴¹两相参照，推测至洪武初年以前太虚宫可能是当地道教管理中心所在。

若以上分析成立，那么益都路太虚宫与东镇庙之间就存在制度层面的“上下级关系”，太虚宫可以向东镇庙派遣道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托管这所国家祠祀。然而，东镇庙毕竟是“国家祠祀”，一所地方道观不可能将之彻底改造为自家“下院”，于是在东镇庙中建造一所专属道教的神佑宫便成为方便守庙道士管理和生活的不错选择。因此，尽管《神佑宫记》信誓旦旦地宣称前代碑刻记载“庙之右神佑宫者，乃知庙道士参礼之所”，但这样的道教建筑在金

941，第764b页。

³⁸ 王瑞：《清虚纯德辅教真人祠堂记》，见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³⁹ 元代地方道官系统的详细情况，参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30页。

⁴⁰ 沂山作为“青州之镇”，由青州（或元代的益都路）道司负责陪同祭祀，要比由临朐县道司陪同更为合理。推测明前期临朐道会司介入东镇庙祭祀事务，可能主要是出于近便等原因的考虑。

⁴¹ 咬哥：《东镇时享之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39-140页；桑哥的斤：《代祀东镇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39页。

代之前东镇仍由庙令管辖的时代却并不容易存在；而在金大定十三年后，考虑到金代东镇庙道士人数不多，即使这座神佑宫真的已经建立，规模也不可能太大。因此，太虚宫或益都路道录司的介入应当可以作为东镇庙道教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神佑宫的建立则可以算是东镇庙道教团体拓展的标志。东镇庙与太虚宫之间的制度性关联，导致太虚宫中的全真道派得以在东镇庙中顺利传播——东镇庙也由此得以“全真化”。与太虚宫或益都路道录司的关系，有可能使东镇庙道团缺少真正的“独立性”。原始材料缺失严重使我们无法了解至治二年至明代初年间双方关系的变迁，但由前揭洪武二年《敕祀东镇庙记》中陪祭道士是“太虚宫守庙道士王德祚、邹德明”的情况，⁴²可以推测太虚宫之于东镇庙的“托管”关系（不论实际上的还是名义上的）有可能维持至少数十年时间。但在洪武二年之后，现存东镇碑刻显示东镇庙不再与太虚宫存在任何关联。事实上，根据《嘉靖青州府志》的记载，太虚宫在明代嘉靖之前就已被改造为青州府儒学。⁴³

从本文附表 1 搜集的永乐四年（1406 年）到成化元年（1465 年）朝廷致祭碑题名来看，明初“道会司”取代太虚宫（益都路道录司）参与到东镇庙的官方祭祀活动中。道会司是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 年）开始设立的县级道教管理组织。⁴⁴综合《嘉靖临朐县志》《康熙临朐县志》《咸丰临朐县志》《民国临朐续志》等材料的记载，⁴⁵可知明初东镇致祭碑上的“道会司”位于临朐县紫微观。紫微观位于临朐县衙以南，在《康熙临朐县志》所附临朐县图中有所反映。此观为元中统年间（1260—1264 年）建，但暂未发现有资料显示元代地方道司设立其中。《山左金石志》著录《紫微观碑阴》，怀疑是中统建观时所刻。⁴⁶明至清，临朐道会司长期定于此观，《康熙临朐县志》给出道会司两位道士姓名“杨和芳；遗徒：李教真。”⁴⁷

⁴² 金斗辅：《敕祀东镇庙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15 页。

⁴³ 冯惟敏等修：《嘉靖青州府志》，卷 7，《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 2014 年版，册 56，第 32 页。

⁴⁴ 参刘康乐：《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金城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3-84 页。

⁴⁵ 冯惟敏等修：《嘉靖临朐县志》，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卷 2，第 14 页，卷 4，第 27 页；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1、卷 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50 页、第 54 页。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卷 4，第 141 页，卷 5，第 147 页；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6，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页 417-418，卷 8，页 449

⁴⁶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21，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新文丰 1988 年版，册 19，第 14719a 页。

⁴⁷ 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54 页。

降至光绪年间，临朐道会司“今无定所”，⁴⁸显示紫微观道教已经失势。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紫微观改为国术馆。⁴⁹在明初官方东镇祭祀活动中，临朐道会司取代了太虚宫的位置，但其却不可能在二者之间建立原先“太虚宫-东镇庙”的“托管”关系。因此，即使永乐四年到成化元年间，临朐道会司参与了东镇庙的祭祀活动，也不会对东镇庙道教团体的独立性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自成化三年（1467年）至清末的东镇庙石刻中，现有东镇碑刻上再也没有出现道会司道士的题名。此时临朐县道会司显然并未消失，题名的缺位显示出其权力和地位的坍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东镇庙道士的“独立性”有所增强。

3、东镇庙道士的地位

整体而言，从元至清，东镇庙道士的政治地位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元至明洪武年间，东镇庙神佑宫可能是由太虚宫（益都路道录司）派驻、托管，此时段主管东镇庙的一些道士拥有相对较高的道官身份。以目前所知最详的梅道隐为例，其不仅出现在至少两个元代东镇致祭碑题名中，还曾作为益都路道判和益都路都道录参与青州的道教活动。⁵⁰然而，与其说梅道隐等东镇庙道士拥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身份，不如说太虚宫道士拥有特权。降至明代，东镇庙道士的政治身份主要反映在参与朝廷致祭活动和纪念碑刻题名中。从附表1可以发现，尽管中央派遣道士担任东镇祭祀官的现象在永乐（1403—1424年）之后就已不再出现，⁵¹但贯穿整个明代，东镇庙的守庙道士均能以正式身份参与东镇祭祀活动。在清康熙统治时期（1662—1722年），东镇庙道士仍可在东镇致祭碑上留下题名，但在康熙之后的大量官方东镇祭祀碑刻中，再无东镇庙道士出现。结合对清代道教史的了解，这一现象反映清代统治者将道教排除在国家祭祀礼仪之外的努力——尽管官方还是需要道士作为义工维系国家祠庙的存在。⁵²

之所以说道士对东镇庙的维持具有一定“义务性”，在于除祭田外，东镇道士无法从官

⁴⁸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5，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⁴⁹ 刘仝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8，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社2002年版，页449：国术馆，“民国二十二年春成立，初以北关财神庙院为馆址，旋移居城南门里紫薇观。经费系省款。以县长周钧英为正馆长，邑人郎益文为副馆长，内设教练二人，招生学习国术。今共有学生三十余人云。”

⁵⁰ 杨志运：《重建昊天宫碑》，见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349页；马骧：《大元降御香之记》，见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350页。

⁵¹ 林巧蔚对嵩山中岳庙的研究也发现明仁宗（1424-1425在位）之后，朝廷改派遣儒臣祭祀中岳，再未有道士充当致祭使者。这一现象代表着“至明朝中后期，祭祀五岳的权利已收回儒家手中。”见林巧蔚：《试论嵩山中岳庙与宋以后国家祭祀礼制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第129页。

⁵² 相应的，道教方面则获得一所由国家提供部分支持的宫观。在某种程度上讲，由道士来打理这座远山中的祠庙，对道教和官方而言是“双赢策略”。

方祭祀中获得经济利益。元至元二年（1335年）《代祀沂山记》记载，当年祭祀东镇前夕，“遂命道士鸣钟鼓、列樽俎醮事焉。”⁵³其余涉及东镇祭祀的元明清碑文均含混地称“有司”负责仪式准备工作，因此不易判断道士参与仪式准备之程度和延续性到底如何。但考虑到诸如铁锅等祭器一直保存在东镇庙中，⁵⁴推测道士长期参与东镇祭祀的准备工作应当合情合理。以清代临朐方志给出东镇祭祀的规定费用为例，便可发现县府所支出的祭祀费用相当低，⁵⁵东镇庙道士没有什么从中获利的机会。⁵⁶

综上，尽管能够反映东镇庙道士政治地位的材料非常少见，但从致祭碑题名等情况可知，自元至清，东镇庙道士未因打理“国家祠祀”而获得特殊的权力和地位。与此同时，东镇庙也从来没能成为地方（不论是临朐县还是青州府）道教的中心。在官方眼中，东镇庙中的道士主要充当着山中祠祀的“义务看守人”。对东镇庙道士的无视态度在地方志文献中也获得反映——如前文所述，历朝临朐县志均未录入任何一位东镇庙道士的事迹。⁵⁷但东镇庙道士并非全然按照朝廷的意愿约束自身功能，而是通过参与东镇庙的修造等活动成为东镇庙的实际维持者和掌控者，在此过程中不断加深东镇庙的道教色彩和民间特色。有关这些情况，本待第二部分详论。

4、诗歌游记中的东镇庙道士

保存至今的东镇碑刻中，以官方祭祀碑所占比重最大，但其中对东镇道士的记述太过稀少零散，很难从祭祀记文中获得东镇道士的描述性信息。但若干赞颂沂山景致的诗歌文章却给出了些许东镇道士的描写，这类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曾刻碑沂山。以下有必要转换角度，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寻找东镇道士的蛛丝马迹，管窥东镇庙道士的日常生活。

⁵³ 刘思诚：《代祀沂山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38页。

⁵⁴ 王居易记载祭器中的三百斤大铁锅保存在庙中。此外，诸如洪武年间敕赐的“桌三十六张”之类，显然不可能收在县衙库房，而只能由东镇庙道士保管。有关这些祭器，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24页。

⁵⁵ 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临朐县赋役全书》记载东镇祭祀支出为“十两”（见《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228页）。这个数字后来又经历减损，《光绪临朐县志》记为“东镇庙祭银九两八钱一分六厘”（卷6，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57页）。

⁵⁶ 这一现象也发生在同样由道士打理的南镇庙中，见马晓琳：《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17页。

⁵⁷ 有关于此，并非东镇祭祀碑记和方志中特有的现象，儒生对将岳镇海渚庙宇交与道士打理怀有一定负面态度，见马晓琳：《国家祭祀、地方统治及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渚祭祀》，《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93-196页。



图 1：东镇图，引自《咸丰青州府志》卷 1

沂山风景优美、林木茂盛，百丈崖、瀑布泉等自然景观驰名遐迩，历史和人文景观均具有很高的游赏价值。青州和临朐等历代方志对这些景观大加赞赏，《民国临朐续志》给出所谓的“临朐八景”中“百丈瀑布”和“沂山晚翠”正是东镇沂山的盛景。⁵⁸不少文人留下赞誉东镇沂山的诗篇，被方志和今人编纂的地方文史著作收录。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偶尔会出现有关东镇道士形象。

明代游览东镇沂山的山东参政陈沂（1469-1538 年）和西峰主人张继孟（卒于 1644 年）的两首诗歌，显示东镇道士擅长笙箫：

陈沂《东镇道院松下看月闻道人吹笙》：月满松荫露满苔，偶乘清夜坐仙台。道人两两闻笙吹，疑是缙山子晋来。⁵⁹

张继孟《观百丈崖瀑布》十绝之六：道士笙箫聒瀑泉，洞中为问有无仙。神仙若有知吾到，定扫云床夜对眠。⁶⁰

⁵⁸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7，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431-432 页。沂山景观的完整介绍，参潘心德主编：《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264 页。

⁵⁹ 陈沂：《东镇道院松下看月闻道人吹笙》，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155 页。

⁶⁰ 张继孟：《观百丈崖瀑布》，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155 页。

东镇道士的笙箫不仅是为了自娱，百丈崖瀑布边的乐声更像是为接待重要宾客而进行的表演。明人欧阳琏的《丙申秋，摄祭东镇登百丈崖时，道士操箫鼓以从》盛赞东镇道乐“狂歌清与箫声和，天乐层霄奏几回。”⁶¹

东镇景观中有一“三歧古柏”较为著名，获得不少记述和赞誉。东镇庙道士作为古柏“奇迹”的解说者，多次出现在东镇游记文章中。王居易在对三歧古柏的描述中写到：“柏在神殿前，殆千余年物。道士相传，每朝廷将有祭祷，即此柏先有声，自本达于树杪，久乃寂然，数日辄有中使至。”⁶²古柏与官方祭祀之间产生通感，东镇道士既是奇迹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奇迹的解说者。王居易的记述很可能是从黄景的作品中继承而来。黄景曾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祭祀东镇，并留下《祠东镇留题》和《咏古柏》等作品，二者均为王居易《东镇沂山志》收录，相关石刻也保存至今。⁶³《祠东镇留题》中的“柏鸣羽客占新典”一句，在《咏古柏》的序言中获得解释：

东镇庙前古柏，不知若干岁矣……典庙羽流云：相传为尧时所植，东一株每有声若吼，远听之则乌乌然，起于本，即之则闻于末。如是者，朝廷必遣祭至，累验不爽。⁶⁴

孟养性嘉靖四十年（1561年）所作《游沂山记》与东镇庙的一起修造事宜有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发现有关三歧古柏和东镇庙道士的一段记述。据孟养性所述，其与朋友游沂山时发现，“一本三歧”的古柏“见存者二，其一倒置于旁，长数围丈，围数尺。”此时东镇庙道士正在为重修庙宇缺少巨木为梁而苦恼，孟养性的友人王守吾建议以倒伏的古柏为梁。⁶⁵刘昺（1401—1489年）的《游东镇偶作》与王文翰（1550年进士）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乙丑夏宿东镇》给出东镇庙道士日常场景的两则描写，前者称：“茂林道者游，深涧仙人迹”，⁶⁶后者则记载“道士住宫人半老，诗人刻石旧加多。”⁶⁷从刘昺和王文翰简单的诗文

⁶¹ 欧阳琏：《丙申秋，摄祭东镇登百丈崖时，道士操箫鼓以从》，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66页。

⁶²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25页。

⁶³ 黄景：《祠东镇留题》、《咏古柏》，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50页；碑石信息和拓片，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48-49页。

⁶⁴ 黄景：《咏古柏》，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48页。

⁶⁵ 孟养性：《游沂山志》，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4页。

⁶⁶ 刘昺：《游东镇偶作》，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50页。

⁶⁷ 王文翰：《乙丑夏宿东镇》，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3页；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318页。

中当然无法获得东镇道士的活动范围和年龄段分布信息，但却可以抓取东镇道士的朦胧印象。

原始材料的稀缺阻碍了对元明清东镇道士情况的更多追索，但保存至今的大量东镇庙修造碑记却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从东镇庙宇的修造活动中窥探道士与这座庙宇日常运作和维系间的关系。

二、“官府-道士-民间” ——守庙道士与东镇庙历代修造工程

隋代以来，东镇庙一直是朝廷设置在沂山的国家祠庙。然而，元代以降，不论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官府对这座祠庙的维系工作都没能做到恪尽职守。对朝廷而言，五岳之属是更具政权象征意义的祭祀对象，⁶⁸作为附属的镇山祠庙的重要性则相对较低，因此对远方庙宇的维持工作并不特别用心。稍后即可发现，宋代⁶⁹以后中央朝廷对东镇庙的日常维系未发挥持续性作用。地方而言，作为临朐县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对象，东镇庙理应获得地方官府的重视。

⁶⁸ 有关五岳祭祀问题，可参牛敬飞：《古代五岳祭祀演变考论》，中华书局 2020 年版。

⁶⁹ 隋唐时期东镇祠庙的修造情况不详，目前仅有《隋文帝诏东镇沂山碑》（开皇十四年，594 年）、《重修东镇沂山祠记》（长安四年，704 年）、《修东镇沂山记》（天宝元年，742 年）碑目存世（见附表 2），而碑石和碑文则早已亡佚。记述宋太祖修造东镇庙的碑石主要有三方，分别是《创建东镇庙记》（或名为《宋太祖诏重修东镇庙碑》）（建隆三年，962 年）、《沂山东镇庙落成记》（乾德二年，964 年）、《东镇沂山界碑》（乾德二年，964 年），三者也已亡佚（见附表），但从碑名等信息可知，此次东镇庙重修为宋太祖下诏所致，是中央朝廷主导的活动。修造工程自 962 年开始，至 964 年结束。除重修东镇庙外，还规定东镇庙享有一片专属辖区。根据《昌国除蝗》等临朐方志记载，隋唐时期“庙故在山椒，距今庙三十里。宋始移于此”（傅国：《昌国除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26 页）。宋代移建东镇庙的活动，实际就是这次宋太祖诏令下的工程。有关《东镇沂山界碑》所记载东镇庙的专享区域，在另外一方也已亡佚的碑刻中得到复述。据成书于 1796 年的《山左金石志》记载，彼时沂山东镇庙中尚存大安三年（1211 年）所立《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碑文申述东安王庙（东镇庙）拥有之山场，禁止百姓砍伐山场树木，委任“知庙道士及庙户人等一同收执”，并列岀犯禁者所当遭受之惩罚（见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20，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新文丰 1988 年版，册 19，第 14712 页）。尽管大安三年《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全文已不存，但前揭元至元二年（1322 年）《神佑宫记》中的一段话抄录东镇庙禁樵采的赔庙土地四至，“东至义道约三里，南至大岭约三里，西至黄泥户洞约二里，北至凤凰岭分水流处为界”。《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8 页。此外，《东镇沂山志》亦记载东镇庙有祭田百亩，“在庙之侧，皆守庙者种之”（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125 页）。

然而，根据下文揭示的碑铭材料来看，虽然地方官员对东镇较为看重，但对东镇庙的维护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既与临朐县的财政和社会情况相关，又与主政者的想法不无联系。有关临朐县自元至清的详细财政情况不得而知，但类似隆庆三年（1569年）《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中的话语却屡见不鲜：

我明厘正封号，度祀有加，庙貌崇严，规制大备。第时久就废，修建维艰。入嘉靖辛卯以来，废殆极矣，而正典亦废。拙于财力，仅成类小室者以奉主位，大不称制。⁷⁰

根据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临朐县赋役全书》和光绪十年（1884年）的《临朐县志》的记载来看，临朐县的财政中并没有专门用来维持东镇庙日常修造活动的经费，每年唯一配给东镇庙的只有约十两纹银的祭祀开支。⁷¹另一个导致临朐官府对东镇庙日常维系用力不足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镇庙的地理位置。东镇庙位于距临朐县城近百里之遥的沂山山麓，对于临朐县府而言，这座国家祠庙既位于空间上的边地，又处于社会意义上的边缘，消极对待成为节约统治成本的必要策略。事实上，正是由于东镇庙距临朐县城太过遥远，明代临朐县民众为方便之故又在县城东北三里的委粟山上建起东镇行宫，方便祭拜，免去长途跋涉之苦。⁷²由于东镇庙远离县府的保护，导致此庙常常受到啸聚沂山的土匪骚扰。而对于时常出现的土匪（详见后文）的忌惮和对庙宇有可能遭到洗劫和破坏的担忧，则又可能加深了地方官府对于资助东镇庙的疑虑。

因此，虽然东镇庙确属朝廷所有的官方祠庙，但仅凭官方之力并不能保障这座庙宇的维系，庙宇的勉强维持还需等待其他力量的介入。最持续关注东镇庙庙貌的人，其实更可能是从金代就开始居住其中的守庙道士。从东镇碑铭材料的记述来看，东镇庙的守庙道士当然希望向官方请求足够的经济支持来保障庙宇完好，但当官方越来越无法满足其要求时，联合包括士绅乡老在内的民间力量便成为更加务实的选择。⁷³于此同时，民间力量对沂山神信仰怀有好感，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愿意介入庙宇的维持工作，以此为个人和社群赢得神灵庇佑，并争取荣誉和社会权力，实现增强社群凝聚力的现实效果——这一点在匪乱深重的临朐地区尤其重要。⁷⁴这导致所谓的“官方祠庙”，常常成为展示民间力量的舞台。道士由此扮演起特

⁷⁰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4-145页。

⁷¹ 《临朐县赋役全书》，见《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228页；《光绪临朐县志》，卷6，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57页。

⁷² 邓鹤：《重修委粟山东镇行宫记》，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5-146页。

⁷³ 这里所谓的“民间”，采取杨美惠的观点，指从“关系”角度而言，促成其运作的机制和关系是非官方的。相关论述参杨美惠著，赵旭东、孙珉译：《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⁷⁴ 明清以来，在匪乱逼迫下，依托庙宇凝聚人心的现象在当地并不罕见。如临朐县五井镇西峪存《清同治十三年重修三元庙记碑》，记载咸丰（1851—1861年）末，土匪劫村，“村民依

殊的中间人角色，帮助民间力量更顺利地进入东镇等官方庙宇之中。由此，以道士打理日常的东镇庙成为中央朝廷、地方官府、民间团体力量交织的场域，庙宇的修造活动则成为表现这些复杂关系的典型方面。有鉴于此，下面以现存东镇碑铭为主要材料，着重讨论金元明清东镇庙的重要修造工程，借此展示守庙道士与官方和民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关东镇庙历代重修，梁勇曾以“东镇庙建设情况表”进行罗列，⁷⁵所列条目已较完善，但其列表仅给出“时间”和“建设性质”两种信息。⁷⁶本文附表 2 则尝试做出两方面调整：第一，丰富信息内容，除年代、建设内容外，同时给出发起者、有否道士参与、碑刻出处等；第二，增入包括神佑宫在内的东镇庙附属建筑的修造活动。表 2 中所列自唐至民国共计 23 起东镇庙修造事宜，但这里的统计数据显然没能囊括所有的东镇庙修造事件。部分记载东镇庙修造事件的碑石消亡、甚至某些修造活动原本可能就没有立碑刻铭。如表 2 中所述正德二年（1507 年）和嘉靖五年（1526 年）的重修活动，便无相应碑铭可考，唯《东镇沂山志》话及此事。⁷⁷然临朐方志对东镇庙修造事宜的记载显然也不完整，表格中金代之前修造活动异常稀少的现象便令人对这些较晚成书的方志的完备性心存疑虑。材料上的问题，使计量分析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这里的研究，但对本文所搜集的经典样本的逐一考察，却可呈现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记载唐宋时期修造情况的碑铭已亡佚，且与本文所关注内容无关。金代正隆四年（1159 年）的《东镇修瓦殿记》碑石和碑文全文也已亡佚，仅《山左金石志》和《光绪临朐县志》著录一些有效信息。⁷⁸元代开始，因碑石、文章俱存，东镇庙一些修造活动的详情可为人所知，以下详论。

1、元大德二年（1298 年）之后东镇庙神佑宫的修造

元至元二年（1322 年）的《神佑宫记》无疑是道教信息最丰富的沂山石刻。此碑长期矗立于东镇庙中，基本信息为《山左金石志》卷 23、《光绪临朐县志》卷 9、《民国临朐续志》卷 17 著录，目前最好的录文和研究则是赵卫东的成果。⁷⁹有关此碑所反映的元代东镇道士

山寨以图存”。事后发现村子半成焦土，唯三元庙安然无恙，认为此庙灵异，故集众重修，供奉香火。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196-197 页。

⁷⁵ 梁勇：《镇庙建筑与祭祀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第 7-8 页。

⁷⁶ “时间”包括朝代和建设年代；“建设性质”实际指建设项目所包括的内容。

⁷⁷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124 页。

⁷⁸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19，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新文丰 1988 年版，册 19，第 14675a 页；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9 之下，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178-179 页；又参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342-343 页。

⁷⁹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8-10 页；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 辑，齐鲁书社 2011 年

情况，前文已结合赵卫东的研究做以讨论，这里着重关注碑文记载的庙宇修造活动。

根据碑文所述，元大德二年（1298年）诏封沂山神为元德东安王，⁸⁰事后参与祭祀者读东镇旧碑，发现天宝、大安等碑称：

庙之右神佑宫者，乃知庙道士参礼之所也。庙之左馆驿者，乃祭者宿斋之处也。又有陪庙之地四至……知庙道士传度师杨道全立石。⁸¹

前文指出《神佑宫记》所录古碑“四至”当出自大安三年的《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但前半段的来源则难以判定。根据下文可知，原本的神佑宫在元大德二年时已不存，次年张德显正式获掌教大真人任命担任东镇沂山神佑宫提点、知元德东安王庙事。按时间来看，颁布任命的掌教大真人是全真道士张志仙（1224—1308年？；任期1285—1307年）。⁸²程越指出元代全真掌教拥有代皇帝祭祀岳镇海渎和任命宗门提点、宫观住持的权力，⁸³与《神佑宫记》所述吻合。然此时既无神佑宫，则“神佑宫提点”一职便尤显突兀。概大德二年诏封元德东安王后，道士们确定重修神佑宫的计划，故在提请张德显接替转任“太虚宫提点”的梅道隐担任东镇提点的同时，⁸⁴一并提请令其担任神佑宫提点，藉此使神佑宫的复建工作获得来自道教上层的支持。

据《神佑宫记》记载，成为神佑宫提点知东镇庙事的张德显随即展开修造工作。“其人任内，建三门，复隐殿，补神像，又于庙右其旧址重修神佑宫。”然张德显不久羽化，太虚宫提点唐志迁继承事业。⁸⁵至《神佑宫记》立碑之前，又“奉上重修，庙宇更张”，最终使得包括神佑宫在内的东镇庙建筑群获得良好修缮。根据此碑正文及碑阴题名来看，这次修造活动虽然有地方官员参与且最终获得朝廷支持，但整体而言却是由东镇庙和太虚宫道士主导的

版，第274-289页。

⁸⁰ 此次诏封碑刻存世，相关信息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2页。

⁸¹ 郦道顺：《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页。

⁸² 参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⁸³ 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⁸⁴ 有关梅道隐转任太虚宫提点而将东镇庙事委托张德显的情况，《神佑宫记》述之甚详。又据《元皇庆二年（1313年）脱欢、蔡文渊昭告碑》题名，可知此前“圆明真静纯德大师”梅道隐曾担任东镇提点，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6页。《元延祐（1319年）六年残碑》题名“圆明真静纯……”，当亦为担任东镇提点的梅道隐，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7页。

⁸⁵ 从《神佑宫记》来看，太虚宫“提点”不止一位，正文之后的题名中除“本宫提点张志迁”外，还有“本宫提点曹志明”、“本宫提点赵志元”、“本宫提点杜道方”等。立碑时全权掌管神佑宫者当为“东镇庙神佑宫住持提点王道融”。见《神佑宫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9页。

工程。非常有趣的是，碑阴题名中本应作为全碑收束的刊石和书丹人题名之后，又列出大量当地庄户百姓的题名，显示碑阴文字至少分两次刻成，地方民众在道士感召下也积极参与此次神佑宫和东镇庙的修造活动。从民众题名可知，此次受到感召的民众基本以个人和小家庭身份参与东镇庙修造活动，与下文将看到的一些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行为有所不同。

有关神佑宫的废止情况缺少直接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李木代祀碑》碑阴题名出现“神佑宫住持崔守诚”，则此时神佑宫尚存。⁸⁶《明成化三年（1467年）重修东镇庙记碑》道士题名为“本庙住持王志琮”。⁸⁷《明成化六年（1470年）李希安代祀碑》中崔守口（诚？）也为“本庙住持”。⁸⁸结合此后明清沂山和临朐方志以及碑石材料均不见神佑宫、王居易《东镇沂山志》所绘东镇庙图（图2）亦不见此宫踪影的情况，⁸⁹推测神佑宫可能在成化初年废止。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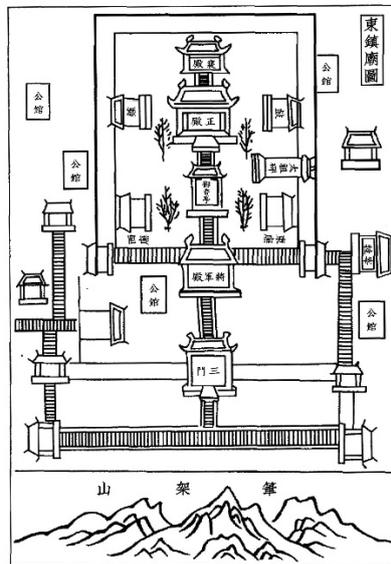


图2：东镇庙图，引自王居易《东镇沂山志》

2、明成化（1465—1487年）至正德（1506—1521年）年间的几次重修活动

明成化年间两次由地方官府主导的东镇庙重修活动，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围绕东镇庙重修

⁸⁶ 《明成化元年李木代祀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32页。

⁸⁷ 刘翊：《明成化三年重修东镇庙记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35页。

⁸⁸ 《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37页。

⁸⁹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插图（无页码）。

⁹⁰ 即将论及的成化三年东镇庙重修活动中，也不见提及神佑宫，亦可作为辅证。

展开的权力和话语博弈。正德十年（1515年）的重修则从反衬出官府对东镇庙的维持和管控存在很大疏漏，东镇庙的维持需多方协作方可完成。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取消岳镇海渎人爵的诏令对沂山东镇庙产生直接影响，巨大的《大明诏旨碑》（即《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碑》）成为东镇庙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帝国建筑之一。⁹¹朝代更替时对正统性和统治合法性的诉求，使中央朝廷在一段时间内尤其关注帝国象征物和象征仪式的维护，对包括东镇庙在内的国家祠庙的修复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尽管文字漫漶、但碑石仍在的《明洪武九年（1376年）敕修东镇庙记碑》记录了明初期中央朝廷下令，委任临朐县府重修东镇庙的情况。⁹²从残存碑文来看，此次重修完全是中央朝廷命令下，由临朐县官府全权负责的修造活动，不见道士和民间力量参与的任何迹象。洪武九年（1376年）至成化初年，朝廷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镇祭祀，但从方志和碑铭的记载来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东镇庙没能获得来自中央朝廷的重修资助。

《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记载了成化三年由临朐县官府负责的重修活动。⁹³据记载，东镇庙“旧在沂山之麓，庙貌废置不一，皆不足以愜观瞻。”成化二年（1466年）冬，原杰（1417—1477年）出巡山东拜谒东镇庙后，叹息“庙之弗飭，何以妥神灵，是可后乎？杰奉命抚临一方，既期民不告饥，岁仍大稔，非神默佑之所致乎？又况事神治民，吾徒之所当尽者乎？”于是命青州府知府李昂、临朐县知县卜钊“力假于民，财出于公”，负责整饬庙貌。面对原杰的叹息和命令，两位地方官员感到惶恐紧张，于是“毋懈毋缓”，立即投入东镇庙的修复工作。工程从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延续到六月，成果是“自正殿及西序，凡一十五楹，神库、神厨、披兵房、宰牲房、门楼，凡二十五楹。我太祖高皇帝御制碑文，楼于其上，及香亭三门凡五楹，外至公馆使客之位，靡不毕具。”原杰的几重拷问无疑是在反复重申东镇庙的国家祠祀性质，对地方官府肩负修缮国家祠庙义务的强调实际就是在坚定官方拥有掌控国家祠祀的大权。原杰的观点获得青州府、临朐县官员们的认同，碑末称“大臣忧国忧民，兴废举坠，而图惟辑宁者，大臣之职也。有民人社稷之寄，而能协志毕力，不劳于下者，守令之职也。”值得指出的是，成化三年的重修确实是官府主持的修造活动，但题名显示包括东镇庙主持在内的至少四位守庙道士参与了相关活动，只是具体负责事项无从得知。

负责成化三年东镇庙重修活动的李昂和卜钊，作为陪祭官员也参与了接下来几年里朝廷使者的致祭活动，如成化四年（1468年）原杰代祀碑、成化六年（1670年）李希安代祀碑中皆列出他们的名字。⁹⁴根据《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可知，当年五月李希安祭告东镇的

⁹¹ 《大明诏旨碑》于岳镇海渎庙皆曾树立，此碑甚为著名，对国家山川祭祀产生直接影响。有关树立在东镇的这方碑刻的基本情况，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6-17页。

⁹² 《明洪武九年敕修东镇庙记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8-19页。

⁹³ 刘翊：《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34-35页。本段引文皆出于此，不赘出注。

⁹⁴ 《明成化四年原杰代祀碑》《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分别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

原因是山东自成化五年（1469年）秋至六年夏持续干旱，“夏麦无成，秋田未种”，望神灵有好生之德，体恤下民，降下甘霖。稍晚，翁世资的东镇庙祭祀，⁹⁵引起东镇庙的又一次修造活动，并在两年之后树立一方纪念性碑刻——《东镇沂山寝庙成记》。据这方树立于成化八年（1472年）的碑刻记载，成化六年干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世资率领李昂等人祭祀东镇，仪式期间发现沂山神像旁设女神配享。秉持儒家立场的翁世资叹息，认为“设神之像以祭，固非所经，复设女神以配其享，尤为渎礼，左右又列男女之神以为从卫，其褻神渎祀孰有过于此哉？”于是命青州府知府李昂纠正。有关沂山东镇庙中有女神像存在的情况，元代于钦的《齐乘》中给出一些线索。于钦记载称，沂山地区存在山神夫妇化身“石翁媪”帮助宋太祖赵匡胤的传说，故当地人又称东镇庙为“翁婆庙”，庙内有石刻神像享受香火。由这一称谓，可推测东镇庙当时应有男、女两位主神神像。同百年后的翁世资一样，针对这一乡野气息浓烈的现象，于钦也嗤之以鼻：“俚俗诞妄，不经甚矣。”⁹⁶面对翁世资的指责，李昂则称，设立女神确实无朝廷礼制依据，但贸然移除女神恐使百姓“疑骇”，建议另创寝庙安置女神，“庶上不失典礼之正，下则顺愚民之心。”翁世资遂同意此建议。寝庙建成后，李昂又向翁世资报告了建造经历，指出工程自成化六年十月开始，至成化七年（1471年）闰九月结束，由官府全权负责修造活动。事后山东地方官员集体请翁世资记述此事，立碑刻石。⁹⁷东镇庙中的这座寝庙意义特殊，后世正殿衰败不堪，这座寝庙被挪充正殿。与成化三年的修造相比，成化六年的修造活动对神像的关注和调整尤其引人瞩目。女神像的存在与李昂的回复显示地方民众对沂山神和东镇庙的认识有别于朝廷礼制。翁世资自然可以从儒家意识形态和礼制出发，要求对国家祠祀东镇庙进行整改，但地方官员却必须考虑地方的现实情况对上官的整改方案做出调整。因此，尽管成化六年的这次修造无疑是一场官方引领和主导的活动，没有任何迹象反映道教和民间人士参与其间，但沂山女神的存在和不可随意抹杀却成为当地民间力量的直观反映。因此，有关女神像的安置和寝殿建造活动，隐含着官方和民间两种话语和理解体系的冲突。寝庙的建立可以看成是两种话语的互相妥协，来自官方的礼制要求似乎占据上风，但沂山女神的继续存在却象征着对朝廷掌控权的潜在挑战。⁹⁸成化三年和成化

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36页、第37页。

⁹⁵ 之所以判断此次祭祀是与李希安代祭不同的另一祭告，原因在于《东镇沂山寝庙成记》中列出的祭祀官员组成与《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不同，尽管二者祭告的原因都是当年山东干旱。

⁹⁶ 于钦：《齐乘》，卷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版，册941，第690a页。

⁹⁷ 翁世资：《东镇沂山寝庙成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38-39页。

⁹⁸ 据调查，沂山地区民众对于沂山女神（东镇娘娘）神像仍存有记忆。据称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东镇爷爷和东镇娘娘神像仍然存在，此后才被捣毁。2006年5月6日，在东镇寝殿下掘出一残像，怀疑是东镇娘娘神像。《东镇娘娘神像残片》，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351页。

八年两次官方重修活动，成为明代士人有关东镇庙的重要记忆，傅国在《昌国榦》中对之做以专门记述。⁹⁹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对东镇庙这样的远郊祠庙的掌控，在持续性上往往比较有限。自上而下的加压和名正言顺的监管确实可以收到实效，但切实地管控一座祠庙却需要持续不断地经济和精力投入，这对于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而言会带来较大的统治成本。当国家衰落、地方贫乏或朝廷对地方祠庙关注有所下降时，这样的成本付出与信仰收益，便显得缺少效率了。¹⁰⁰

根据《东镇沂山志》的记载，东镇庙在正德二年（1507年）和嘉靖五年（1526年）分别出现青州府同知杨谏和临朐县知县王舜民主导的重修活动。¹⁰¹但有关这两次重修活动的细节却并无任何材料可资参考。同书卷4保存的《重修东镇庙记》是青州府同知杨谏所撰的碑记，碑石今已不存，其所记者为正德十年（1515年）由青州知府朱岚溪下令的重修活动。¹⁰²据碑文所述，正德十年六月，新上任的朱岚溪发觉东镇庙“庙宇倾圮日甚，弗称吾皇尊崇之意”，于是命令沂水县、临朐县地方官负责重修，后者筹集纹银四百两用于重修项目。然地方官面临的情况异常艰难，“今以饥馑相仍，乌合弄兵，于青者为尤甚。故材木四空，民生告劳也甚矣。水不可舟，山不可车，恒以弗克就绪为惧。”于是再次征询朱岚溪意见，希望增加负责人员，群策群力。朱岚溪同意建议，在其斡旋下动用大量民力物力，不惜远途运输，半年后修庙物资方大致完备。杨谏似乎对朱岚溪在民生不济时仍执着修庙的“劳民伤财”之举有所不满，以暗含谴责的语言评价道：“其木石转运远至千里，近亦不减百里，左牵右曳，民若弗胜。”在地方人士进一步捐献巨木后，材料终于齐备，东镇庙重修工程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正月正式动工，耗时四个月完成。从杨谏的描述来看，修造工作并无任何扩建和更改，而主要是翻新和加固旧有建筑结构，“文章虽如旧式，而劳实过之。”毫无疑问，此次大型重修活动也是官府主导和引领的工程，但杨谏对重修之前东镇庙的破败及对青州、临朐地区的统治困难的描述，印证了官府对这座“居深山穷谷”的东镇庙的管控和维系能力在持续性方面的缺陷。尽管官府可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东镇庙进行大规模修缮，但这样的修缮活动却充满“心血来潮”的意味，而这样的问题也为道教和当地民间力量深入东镇庙的维系工作提供了机会。

与元朝的情况相比，上述明洪武、成化、正德年间的修造活动，显示出官方对于民间力量的抵制和对守庙道士权力的限制——责任与权力之间存在对等性，地方官府主动承担责

⁹⁹ 傅国：《昌国榦》，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25-26页。

¹⁰⁰ 考虑到中央朝廷在京城年度祭祀中已经为东镇等地方神设置牌位，朝廷对这些山川神灵的祭祀未必会因地方庙宇的破败和混乱而受到巨大影响。

¹⁰¹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24页。

¹⁰² 杨谏：《重修东镇庙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2-143页。此碑业已不存，无法判断是否有题名、题名中是否又有守庙道士。

任，意味着对东镇庙所有权的严格把握。然而，毕竟朝代有兴衰，人事有兴替，唯有居于沂山的道士和民众长期环伺在东镇庙周围，他们对于这座庙宇的权力渗透和功能运作，在嘉靖之后的几次修造活动中逐渐得到展现。

3、明嘉靖（1522—1566年）至万历（1573—1620年）年间的几次修造活动

沂山地区山林茂密，历史上是著名的匪寇聚集之所。匪患严峻的情况，对东镇庙的日常运作产生直接影响，以神力剿灭匪患成为沂山神的一项特殊功能。金正隆四年（1159年）《东镇修瓦殿记》中记载伪齐阜昌年间（1130—1137年）“巨寇类臻啸聚此山，余党归集满万余数”，地方官田绍祖题诗东镇庙壁，当日大破类臻，剿灭贼巢。¹⁰³当沂山神在剿匪活动中发挥作用时，作为酬谢，地方人士会选择以修缮东镇庙等方式报答神恩，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的东镇庙重修活动很可能就发生在类似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重修是募集十方之力的结果。

据王居易《东镇灭寇记》所述，嘉靖丙辰年（三十五年，1556年），“巨寇赵慈等恃强为乱”，将攻临朐。赵慈进攻前，先往东镇庙卜签，三卜皆得下下。赵慈盛怒而去，未十里遭遇官军。双方交战间，风向突变，有利官军，贼寇大败。事后官军讯问俘虏，后者称战斗时看到东镇神助官军作战，故有此败。王居易感慨道：“以为东镇之灵应，果不负国家崇祀之意云。”¹⁰⁴或许就是在这次官军战胜赵慈之后，地方人士开始筹划重修东镇庙。王居易为这项工程撰写了《重修东镇庙缘簿引》。¹⁰⁵王居易在倡议中指出，东镇庙状况堪忧，“正殿寝宫

¹⁰³ 原碑及碑文均不存，碑文节录见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9之下，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79页。

¹⁰⁴ 王居易：《东镇灭寇记》，见其《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3页。同一事件在傅国《昌国除蝗》（卷8，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57页）等材料中也得到记载。

¹⁰⁵ 一些著作依据《东镇沂山志》的记载将《重修东镇庙缘簿引》的作者写为“前人”。但考察《东镇沂山志》的录文体例可知，此处的“前人”指与上一篇文章作者相同。这份募集号召，紧接于王居易《东镇灭寇记》之后，作者为王居易无疑。《重修东镇庙缘簿引》没有写明年月，笔者判定其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修庙有关的依据如下。1、王居易在《东镇沂山志》中将自己的两篇文章《东镇灭寇记》《重修东镇庙缘簿引》相临排列，暗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2、《康熙临朐县志》明代“义士”中给出侯之屏、刘泮、陈巽言等人参与“丙辰修东镇庙”工程。明代丙辰分别有：洪武九年（1376年）、正统元年（1436年）、弘治九年（1496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其中洪武九年重修碑残存，不见几位义士题名；现存材料不见正统元年、弘治九年重修东镇庙的蛛丝马迹；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东镇庙刚刚获得大型修缮（见下文），正常情况下不应在一两年后立即重修。故《康熙临朐县志》所述之“丙辰修东镇庙”最可能指嘉靖三十五年丙辰。3、下文将提及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东镇庙又展开重修工作，笔者之所以不认为《重修东镇庙缘簿引》与之同为一事，原因在于嘉靖四十年《重修东镇庙题名记》中没有出现《重修东镇庙缘簿引》作

半遗，夫故趾迴廊翼室奚取于虚名”，“断础残碑竟剥蚀于风雨”。¹⁰⁶事实上，《临朐编年录》提及嘉靖廿八年（1549年）时东镇庙曾建小殿。¹⁰⁷临朐知县王家士编修，成书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的《嘉靖临朐县志》亦记载其对东镇小殿的修造活动，称东镇庙“岁久倾颓……建小殿三间，以覆神像。烧砖数万，但巨木难得。镇庙祀典非他兴作可拟，焕然鼎新，固有待于丰年邻邑共成之力也。”¹⁰⁸可见，东镇庙的破败不堪，地方官府无力维持，已经是存在已久的难题。面对东镇庙的残败不堪，此时的王居易将一切责任归结为官府的不作为——“盖上既狃于因循，斯下遂成夫玩愒”。考虑到这份募缘通告具备公开宣示的性质，这样的批评多少显得有些激烈。类似的，就在王居易的这篇文章中，还有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用语——“燦盛虽洁于春秋，壮丽难凭乎轮奂”。春秋、燦盛指朝廷礼制规定的春秋祭祀，“轮奂”则指东镇庙的实体建筑。显然，王居易是在批评官方仅将东镇庙作为偶尔祭祀的场所，但对东镇庙的日常情况却毫不关心。在这里东镇庙似乎被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官方-偶尔的祭祀场所”与“民间（包括守庙道士和周遭百姓）-日常的信仰中心”。对于傅希孟领导的地方官府的失望，¹⁰⁹使王居易及其背后其他关心东镇庙的当地人士不再将官方作为依赖对象，

者王居易的名字，同时也没有出现侯之屏、刘泮、陈巽言三人。

¹⁰⁶ 王居易：《重修东镇庙缘簿引》，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3-144页。

¹⁰⁷ 张敦仁：《临朐编年录》，卷6，见《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97页。

¹⁰⁸ 冯惟敏等修：《嘉靖临朐县志》，卷2，见《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3页。

¹⁰⁹ 《嘉靖临朐县志》记载王家士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担任临朐知县（卷2，见《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7页）。东镇庙保存王家士写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的“诗碑”，以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陪祭题名（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75-76页）。嘉靖三十二年，傅希孟开始担任临朐县令，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由郭镇出任此地县令（见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1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99页）。但《康熙临朐县志》所录临朐县知县名单中，王家士与傅希孟之间还有一卢云龙，仅录人名，并无其他记述（卷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52页）。但无论如何，本节涉及的嘉靖三十五年与嘉靖三十七年重修，都是在傅希孟担任临朐县令期间的活动。与王家士嘉靖廿八年的作为相比，傅希孟虽然按照礼制规定参与沂山祭祀，并曾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留下谒庙“诗碑”，但却对东镇庙的重修活动不甚用心。或许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对比，才引起王居易等地方精英的反感与谴责。傅希孟的“诗碑”已亡佚，碑石信息为地方金石文献整理著录，见《沂山石刻名录》，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下任临朐县令郭镇也有沂山“诗碑”传世，其所造访的是东镇附近著名的自然景观百丈瀑布，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77页。

转而向民间请求帮助：“但积少成多必旁求乎列邑，而绝长补短须仰赖于十方。为此，竭诚专祈共济。或贫或富，量所有以相周；无智无愚，随其心而协助。”于是，正如《康熙临朐县志》所记载的那样，这次丙辰年的东镇庙重修活动，获得当县“义士”多种赞助，包括“助菜三年”、“助砖瓦五万”、“助石灰五百秤”等等。¹¹⁰

如果此次重修确实如本人判断的那样发生在平定赵慈匪乱之后，那么地方官府在财政和维稳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是导致其无法成为修缮活动的组织者的重要原因所在。从王居易对地方官府的批评言辞来看，临朐县府很可能完全缺席了这次东镇庙的重修活动。而临朐县府的退出，最终使民间力量得以有组织、成规模地进驻东镇庙。不难理解的是，官府让渡责任，同时也就让渡了权力。有关嘉靖三十五年的这次重修活动，目前并无其他材料可资查考。但一年多后另一场修建活动的兴起，却不免令人推测此次重修的成果很可能相当有限，经历兵乱的地方社会也需要时间来平复创伤。

时间来到嘉靖三十七年，一场历时四年的重修活动即将展开。对我们而言最为有趣的是，这次重修活动中扮演主角的是东镇庙道士。在致祭碑刻、地方志等带有官方性质的材料中，东镇庙道士的活动常常遭到刻意的掩盖和无视，但记载这次重修活动的一方碑石终于使这些默默无闻的道士走到历史的前台。嘉靖四十年（1561年）九月所立的《重修东镇庙题名记》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原委。碑铭记载：

东镇庙宇，近年以来，风雨摧残，神像暴露，本庙住持唐教玉等，具呈到县，转申本府兵备道给印信，□□缘募四方钱粮。临朐、沂水二县城，夫役督工，修理寝殿五楹，具用琉璃瓦兽，两廡十楹，灵星门一座。自嘉靖三十七年起工，至四十年落成。四方施财达官长者姓名，籍此碑阴开列于后，以识岁月。¹¹¹

这段文字宣明此次东镇庙修复工作所包含的内容，同时阐明重修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是东镇庙唐教玉等守庙道士。从碑文来看，包括临朐县、沂水县甚至青州府在内的地方官府对唐教玉的重修给予鼓励。然而，除允可唐教玉的募缘行为外，地方官府仅“夫役督工”予以配合。实际为此次重修活动前后奔走的则是“道士陈崇进，募缘住持唐教玉，助缘杜教用、郇一林、王教洪、李教允、孟道胜、申道贵”，以及最后题名的“住持崔崇祐”。从唐教玉自主募缘行为来看，东镇道士已不将维系东镇庙的主要义务寄托在地方官府身上——事实上，地方官府的长期不作为或无能为力正是导致东镇庙破败的主要原因。官方“印信”对道士的募缘活动确可提供一定帮助，尤其是可以使本质上是“民间”募资的活动渲染上一些“官方”色彩，有利于争取地方官员、士绅慷慨资助。从碑石题名来看，这样的策略确实收到预期效果，尽管地方官府没有从“官方层面”给予制度之内的经费支持，但不少当地官员还是以个人身份

¹¹⁰ 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87页。

¹¹¹ 《重修东镇庙题名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78页。所谓“籍此碑阴开列于后”并非指此碑文字分别刻于碑石之两面。《重修东镇庙题名记》借用嘉靖六年诗碑之背面刊刻，故有此说。标点略有修改，原文“兵备道”被点断为“……兵备，道……”，不确。

参与捐赠；同时“临朐乡民”、“沂水乡民”、“昌乐乡民”纷纷解囊，尤其以东镇庙所在的临朐县乡民捐献人数最众。

有关此次重修活动的结果，前揭孟养性的《游沂山记》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文章称，孟养性在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年）九月与弟子读书东镇庙。据《重修东镇庙题名记》所记，当月初一即唐教玉主导的重修活动告成立碑的时间。《昌国榦》等书记载孟养性曾任武定学正，¹¹²其是否捐助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东镇庙活动不详，但《重修东镇庙题名记》官员题名中监生中有一“孟□□”，¹¹³而《康熙临朐县志》将孟养性列为“贡生”。¹¹⁴明代贡生可入国子监学习，即为监生，或此监生“孟□□”即“读书东镇”的孟养性。从孟养性的文字来看，他自嘉靖四十年九月至次年（1562年）九月初一直在东镇庙中读书讲学。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友人王守吾来访，夜宿其馆，拜谒神灵，游览庙宇，发现“登阶环视，殿宇狭小，不称神居。”庙中道士解释称：“庙制高阔，原见视泰岳，岁久圯废，遗址虽存，巨木难觅，工役之大，非通省协力莫能复也。”¹¹⁵王守吾给出以枯柏为梁的建议，但从马上就要介绍的隆庆和万历年间重修情况来看，这则建议并没有获得采纳。将孟养性的这段记述与前引《重修东镇庙题名记》文字相比较，不难发现此次重修的效果同样不理想。重修工程主要包括寝殿和灵星门，¹¹⁶而并未触及最重要、损毁可能最严重、修缮难度也最大的正殿。但嘉靖三十七到四十年重修活动，依旧为我们揭示出有关东镇庙日常情况的重要信息。首先，在制度上来看，守庙道士没有义务为东镇庙的维持付出过多努力，修缮国家祠庙的工作本应是官方本分。但在现实中，官府每每无力也无心妥善管理这座国家祠庙，致使居住其中的道士必须承担起一些责任。承担责任的同时，这些道士也便可能获得灵活而合理地运作东镇庙的一些权力，比如后文将要提到的代领民众在庙中建醮。其次，庙宇的完备或倾颓，直接影响着庙中道士的切身处境，但住庙道士同样没有充裕的经费来维持这座庞大的庙宇，因此争取官府和民间力量的支持便成为必然选择。当官方不能给予充分支持时，守庙道士与民间力量的合作在维系庙宇方面便尤显重要。与此同时，以士绅、乡老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也便有机会进入东镇庙，并对这座祠庙产生深远影响。不得不承认的是，唐教玉领导的重修活动使我们

¹¹² 傅国：《昌国榦》，卷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34页。

¹¹³ 《重修东镇庙题名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78页。

¹¹⁴ 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58页。

¹¹⁵ 孟养性：《游沂山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4页。

¹¹⁶ 东镇庙中发现刻有“灵星”二大字的残石两块，可拼合，拼合后高52cm，宽84cm，右侧书“大明□□□十七年闰七月之吉□”。张孝友等人指出右侧缺字为“嘉靖三”及“旦”，而此石即嘉靖三十七年重修东镇庙灵星门的成果。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看到官方、道士、民间势力任何一方都无法长期为东镇庙提供保护，勉强维持成为明中期以后东镇庙的常态境况。三方在修缮东镇庙工程中的协作、推诿以及由此而来的实际控制权的博弈，导致东镇庙的“属性”产生游移。对于这些不同人群的不同目的而言，东镇庙既可以是享受朝廷制度性祭祀的“国家祠庙”，也可以是一座名正言顺的道观，同时还能够成为寄托民众情感和信仰实践的“民间庙宇”。

自嘉靖末年重修工程之后，官府、道士及民间精英合作修缮东镇庙，成为常例。这里可以再举隆庆三年（1569年）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两个例子做以观察。隆庆三年《重修东镇庙碑记》的原石磨损严重，仅有三十余字可辨识，¹¹⁷但这篇由临朐县著名乡贤迟凤翔所撰写的碑记却因《东镇沂山志》的收录而保存完整。根据碑文记载，东镇庙自嘉靖辛卯（十年，1531年）以来年久失修，“正殿亦废。绌于财力，仅成类小室以奉主位，大不称制。”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年）县令张体乾上任。¹¹⁸次年改元，朝廷遣使告祭东镇，张体乾在东镇庙中临时搭建大棚举办祭祀，虽解一时之急，但“所费不貲”，且非长久之计。于是寻求一劳永逸之策，但“公私俱竭，计无所出。”岁至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其岁大稔，乡民陈镗等人“请愿助工以拓神居”。张体乾自然乐见其成，并从民众中选取“选殷实好义”者监督工程。临朐县乡民积极参与，未及一月积累四百金。九月九日，张体乾祭土正式开工。此时张体乾等人发现恢复正殿非千金不可，但同时发现“寝宫宏丽”，故与乡民商量将寝殿改为正殿，将沂山神像移入其中，另建寝殿安置沂山女神。经一番磋商，计划得到执行。寝殿的“宏丽”，显然要归功于唐教玉主导的那次重修活动。张体乾的重修据说起到不错的效果，至隆庆三年己巳年（1569年）四月落成时，“虽未尽复建置之初，视往昔殊大备矣。”¹¹⁹从以上叙述可见，这次重修活动虽然是由临朐县官府许可和深度参与的活动，但维修经费却完全仰仗地方民众的支持。同时，尽管碑记中并没有出现任何道士的身影，但带有官方背景的纪念性文章并不是没有刻意掩盖道士活动的可能。就在东镇重修刚刚结束后的五月，张体乾所作的《颂东镇诗碑》就被刻立于东镇庙中，刻碑人包括县丞赵凤、张巍、典史张洪，以及“本庙住持崔崇祐”。¹²⁰根据迟凤翔《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来看，除崔崇祐之外的这几名官员都参与了隆庆三年重修东镇庙的筹划工作。尽管仍无法确定此前曾参与嘉靖末年重修东镇工程的崔崇祐等道士是否也在这次重修活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有理由相信他们恐无甩手旁观的可能。

万历四十二年的重修活动中，临朐县令的作为与之前的张体乾类似，但相关碑记没有忽略东镇庙道士的存在。赵秉忠所撰《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石今存，裂为三块，部分残缺，

¹¹⁷ 此碑及作者迟凤翔的基本情况，参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¹¹⁸ 张体乾基本情况，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¹¹⁹ 迟凤翔：《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3年版，第145页。

¹²⁰ 张体乾：《明隆庆三年张体乾颂东镇诗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84页。

方志文献未著录此碑。¹²¹根据残碑所述，东镇庙又一次陷入“岁久浸坏”的境地。万历三十九年，麻友椿担任临朐县令，¹²²当年秋祭拜沂山东镇庙，“环视庙制渐颓”，希望修缮，但苦于力不能及。后在地方儒士陈致恭、乡耆王来聘等人请愿下，临朐官府与民间力量一同展开募集和重修工作。由于较为顺利地获得最难寻获的巨木，“不三月而大殿落成”，而后又修复了寝殿、钟鼓楼等建筑。碑文的后半部分一如既往地大部分功劳归功于作为领导的地方官麻友椿，但在碑阳最末的题名中却没有忘记给东镇庙主持吕玄阳等人留出位置。有关此次东镇庙重修的“官府-道士-民间”三方合作情况，在碑阴题名中表现更为明显。尽管碑石存在残缺，但现存碑阴题名依旧能够看出几种明确的人员分类，包括地方生员、儒士吏员、乡耆、东镇住持、工匠，以及除住持外的三十三位“本庙道士”。列名其间的道士赵守身我们已不陌生，其正是《东镇述遗记札》的作者。

最后，以目前所见材料来看，明代东镇庙的重建工程中有一现象较值得注意。受封青州的衡藩热衷道教信仰，拥有家庙，衡王及王府官员也资助过多个青州府辖区内的道观修造活动，¹²³但却似乎对东镇庙的修造毫无兴趣；同时，从现存资料来看，东镇庙道众似乎也从没向衡藩求助的打算。尽管没有其他材料的佐证，但这一现象有可能反映藩王主动回避卷入拥有地域统治合法性象征的东镇庙的相关活动，以免遭到觊觎帝国权力的怀疑和指责。

4、清康熙二年（1663年）和四十年（1701年）、四十一年（1702年）的三次修造活动

清朝取代明朝之初，对于作为统治象征的岳镇海渎庙的祭祀提起重视。就东镇而言，保存至今的碑目显示，最晚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便开始派遣使者致祭沂山。¹²⁴但清代东镇庙的首次大型重修似乎直到康熙二年方才展开。

康熙二年的重修活动留下两篇原始记述，皆为临朐县进士张印立撰文，分别是《重修东镇庙记》与《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从内容来看，《重修东镇庙记》似乎不是为了刻碑而撰写的文章，目前也没有发现刊刻这篇文章的碑石。此文撰写于重修工程开始之前，约为康熙元年（1662年）之作。文章前半讲述沂山和东镇庙的圣境美景及庙宇现状，提及因读前朝重修碑得知女神移入寝殿等掌故。文章后半强调“治民事神，司土之责”，指出经过明末战争的摧残和岁月轮替的洗刷，东镇庙“久雨侵飘瓦矣”。康熙元年秋，“司土者”谢赐牧祭祀东镇，适值淋雨，大殿淋漓，于是召住持道人朱全周商议重修庙宇。此时发现，庙宇为雨水侵袭损坏者，“岂惟大殿，盖后寝殿及两配殿尤甚，而大殿前龙亭复颓废无余，而中门左宰牲亭又

¹²¹ 此碑现状及拼合情况等，参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6-187 页；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87 页。

¹²² 有关麻友椿，参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52 页。

¹²³ 冯裕：《重修驼山昊天宮记》，见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济南：齐鲁书社，2010 年，第 15-16 页；等。明代藩王对道观的支持，参王岗著，秦国帅译：《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4-174 页。

¹²⁴ 张孝友便：《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9 页。

久属子虚。”¹²⁵《重修东镇庙记》行文至此基本结束。据《光绪临朐县志》记载，有心重修东镇庙的谢赐牧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开始担任临朐知县，至康熙八年（1669年）邓开桂继任。¹²⁶另一篇由谢赐牧撰写、张印立书丹的《重修纪山庙记》显示，康熙三年（1664年）谢赐牧还与地方善信及纪山庙道士合作，修复了这座年久荒败的庙宇，¹²⁷可知谢赐牧对于修复地方庙宇的工作较为用心。张印立的《重修东镇庙落成记》是此次东镇庙重修工程完成后的纪念文章，碑石现存。¹²⁸碑文前半讲述沂山东镇庙的光辉历史，接着指出当时东镇庙已颇为萧索，“榱桷不蔽风雨”。“祁闾春台谢公”谢赐牧担任县令六年来，祭祀东镇十余次。与张印立在之前文章中的记述对应，康熙元年秋谢赐牧祭祀东镇时恰值淋雨，发现东镇庙年久失修，于是有兴复之愿。次年（1663年）春旱，谢赐牧求雨东镇庙，顿时云兴雨至。值此之际，谢赐牧正式倡议重修，带头“捐俸百三十金”，官吏乡耆积极响应。工程自康熙元年九月初提议，至康熙二年十月结束，“凡添瓦五万余个，用灰七万余斤，易椽千有余根，凡阅岁余而轮奂之，厘然者犹孔庙也。而龙亭、宰牲亭，且钟兴焉，而海神，亦得肃然垂绅端笏于别殿内。”¹²⁹接下来的记载非常有价值，文中细致讲述庙中道士为重修东镇庙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这座“道观”中道士内部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据张印立所述，东镇庙道士“曹口惟”，雇人于庙门外挖土，挖出石灰数千斤，“曹秘不以宣，曹徒有石冲月者，暗追此息，庙众皆知之，弗敢先发也。”至康熙二年三月，“督工诸公”向曹索取，“曹弗吐，已命冲月弟冲明于所在掘之。”这一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曹口惟”，可能就是万历四十二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三十三位道士题名中的“曹真惟”。¹³⁰根据《重修东镇庙落成记》最后的题名可知，此次工程有督工和督摧道人的职位，与曹真惟对峙者应当就是这些人。督摧道人的首位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赵守身，根据题名位次来看，他的地位已较万历四十二年时高出很多；同为督摧道人的祖悟赞则是赵守身的弟子。¹³¹尽管张印立没有记载是否对曹真惟进行惩罚，但公开树立的碑刻却可以成为曹真惟等人的耻辱柱，曹真惟及其弟子恐怕不便在东镇庙中继续常驻。张印立笔下还记载了另一个道士募缘事件。临朐县牛家沟牛四家有杨树一株，

¹²⁵ 张印立：《重修东镇庙记》，见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95页。

¹²⁶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11下，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204页。

¹²⁷ 谢赐牧：《重修纪山庙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05-207页。

¹²⁸ 此碑首原本残缺，近年征集寻获，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¹²⁹ 张印立：《重修东镇庙落成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92页。

¹³⁰ 《沂山石刻》编者补此缺字为“左”，不知何据。

¹³¹ 《清康熙十六年道士赵守身墓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95页。

道士募化三次，但牛四始终拒绝施舍，不久身患重病。家人为之捐献杨树，但牛四最终病亡。不论这则募缘牛四事件多么不符合今人的价值观，但却仍能展现东镇庙道士为庙宇重修工作所付出的百般努力。通过这两次获得记载的募缘行为，可以想象，多数东镇庙的重修工程（即使是地方官府所领导的项目）背后，可能都有往来民间募化经费的守庙道士身影。或许是由于他们的募缘行为太过正常，或许是因为官方碑记常常掩盖道士的功劳而突出地方官的卓越，相关记载总是遮遮掩掩。

三十八年后，东镇庙迎来又一次重修。据陈霆万所撰康熙四十年《重修东镇庙碑记》记载，此时东镇庙复又破败。张曾裕担任临朐知县第三年（1697年）时，¹³²计划修葺庙宇，“召黄冠为疏以募资”。¹³³后张曾裕丁忧离任，陈霆万继任知县，工程最终完成于后者任内。据陈霆万所述，此次工程“群力肩多，谋始则昆诒张君，而黄冠王正位实与劳勋焉”。根据这方碑记的题名可知，王正位正是此时东镇庙的住持。此次修缮完成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八月，前后共计数年时间，因碑记不详，不知到底修缮了哪些方面。但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又一其修造活动来看，前一年完工的修缮活动恐怕谈不上完备。据当地儒学训导陈维寅所撰《重新东镇神像记》可知，彼时东镇庙中神像缺损，有人计划以“木主”代替神像。但当地民众对这一计划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神像不合旧制，且无法令普通百姓升起虔敬之心。于是在当地“乡耆会首宗炆、张捷”带领下，“结社纠资”，雕造出新的神像，于康熙四十一年七月立碑纪念。¹³⁴根据以上记载，可以发现地方精英组织的会对东镇庙的维系作用相当大，宣称“守兹土者，是余之责”¹³⁵的临朐县府做起事来却捉襟见肘。

《重新东镇神像记》的题名显示，参与神像修造者除地方社众外，还包括徐和风、刘无祥等多位道士。造神像一事之外，这方碑铭中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当地民间力量进入东镇庙的线索，有必要引起注意：

况沂山之神□镇东方，天子遣官致祭，有司春秋告祀，水旱□疫，有祷必应，远近进香设醮者，络绎而至……¹³⁶

对于东镇庙的使用，朝廷有一套礼制规定，而民间也依其常规信仰模式前来进香、设醮。有

¹³² 据《光绪临朐县志》卷11记载，张曾裕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担任临朐知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陈霆万继任。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204页。

¹³³ 陈霆万：《重修东镇庙碑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01页。

¹³⁴ 陈维寅：《重新东镇神像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03-104页。

¹³⁵ 陈霆万：《重修东镇庙碑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01页。

¹³⁶ 陈维寅：《重新东镇神像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03页。

材料显示东镇沂山在清代或更早便已经出现春秋两季的庙会，吸引四方百姓辐辏参与。¹³⁷最晚在清代康熙年间便有民众在东镇庙设醮一事更有碑石可证。《仁寿乡盘羊社修醮残碑》存于东镇庙中，记述临朐县仁寿乡盘羊社在若干会首带领下，于东镇庙修醮三年，功德圆满，勒碑纪念。¹³⁸因碑石残缺，确切系年不详，但碑文记载带领民众建醮的“玄门弟子苑静云”，又出现在前揭康熙二年《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中，可推断盘羊社建醮事亦当发生在康熙初年前后。《仁寿乡盘羊社修醮残碑》显示东镇庙在当时确实获得来自朝廷和民间的双重祭祀，其作者认为朝廷有春秋致祭的制度，“在上者，既已如斯也”；而受东镇沂山神庇护的乡野小民也当祭祀报恩，以东镇庙道士带领修醮的方式回馈神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渠丘泊里庄碑记》是一篇民间社会东镇建醮的纪念性文章，记载安丘县西乡泊里庄村民，在会首任复初带领下在东镇建醮一事。此时担任东镇庙主持的是李德仁，负责此次醮仪的则是“领醮弟子于德江”。¹³⁹东镇庙虽然位于临朐县，但从这则建醮记可以发现，其在地方的信仰辐射并不局限于临朐一县，包括安丘县在内的周边县区也被吸引而来。据《沂山石刻》编者转引的赵守身《东镇述遗记札》所述，泊里庄修醮碑记至少还有三块，“先者南宋嘉定十五年，祈攘兵戈之灾；次于元至正七年祷息地震；三者隆庆二年禳祛水患。”¹⁴⁰若其言可从，则当地民众于东镇庙修醮的传统便可追溯到宋代；而即使所言不实，也至少证明在赵守身生活的明末清初，东镇庙为地方民众修醮已然成为一项日常服务。

康熙之后，东镇庙成规模的维修活动似乎到嘉庆五年（1800年）才再次出现，而此次重修是配合乾隆配享圆丘礼成告祭岳镇海渎活动而来。¹⁴¹此后至清朝结束，未见官方重修东镇庙的任何线索。地方民众而言，嘉庆十一年（1806年）地方民众自发在“沂山东镇之西口”修三元庙一所，¹⁴²但由于“西口”残泐，不详此庙是否在东镇庙中，碑文亦未透露三元庙是

¹³⁷ 本人在已知的临朐方志中未发现沂山东镇庙会的记载，但《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指出：“《古拾遗》云：‘东镇庙会、山会为一年二会，春于“放生节”（农历四月初八）’，秋在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香客游人，商贾摊贩，八方麇集，面广三州数十县。人众如潮，拥塞官道，延至山际。杂货土物充斥市面，售购兴旺。时短经旬，长则半月余。庙会繁华，不亚于唐之香火。”然而，因《东镇沂山》并未给出文献来源，本人又未能在常见古籍库、方志库中发现《古拾遗》原书，无法确定《古拾遗》到底是怎样一部著作，故有关古代东镇庙会的问题暂时不便深究。有关当代东镇庙会的情况，参马广田、马广海：《沂山东镇庙和东镇庙会》，《民俗研究》1990年第3期，第61-62页。

¹³⁸ 《仁寿乡盘羊社修醮残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32页。

¹³⁹ 《渠丘泊里庄碑记》，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207页；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96页。

¹⁴⁰ 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¹⁴¹ 《清嘉靖五年庚音布致祭碑》《清嘉靖五年重修东镇庙落成诗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17-119页。

¹⁴² 胡树：《新建三元庙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否与东镇庙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暂置之不论。咸丰（1851—1861年）至民国时期，临朐和沂山地区土匪纵横，¹⁴³东镇庙道士离散不堪，¹⁴⁴以至东镇庙“祀事不修，人际罕至，时有匪徒啸聚其间，空山梵刹庙宇益荒颓矣。”¹⁴⁵东镇庙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家祠祀”，官方便也无义务提供支持；东镇道教的衰落又使与此庙兴衰利益最为关切的人群消失殆尽。自此东镇庙的修造活动只能委地方结社以重任，如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之寝殿重修即属其例。¹⁴⁶

以上完整回顾沂山东镇庙从元至清有史可查的修造事件。与想当然的猜测不同，尽管东镇庙拥有“国家祠祀”的崇高地位，是岳镇海渚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会依礼制规定对之进行各式各样的祭祀，但中央朝廷似乎更关注东镇的“象征性”而非其“实体”，对于庙宇的日常维持用心不足。临朐县府虽然反复重申维系东镇庙貌是其“守土之责”，但却常常因人力、物力、财力、观念等原因而袖手旁观，放任庙宇倾颓，导致官方主动且一力承担的大型修造活动显得比较少见。此情况下，守庙道士和当地民众便成为维持东镇庙更具持久力的关键因素，尽管二者实际拥有的经济能力同样捉襟见肘，但在持续性层面却显得比官府更有耐力。这些地方力量既可以单独主持东镇庙的修造活动，又可以与官方合作深入参与修造事宜。可以想象的是，东镇庙日常维持所必需的各种小型工程也必然是由庙中道士和地方民众亲手操持，尽管这些琐碎的“小项目”很难在任何碑记中得到反映。责任的分担，导致控制权和话语权的分享。东镇庙由此不单成为一座演习“儒家礼仪”的国家祠庙，同时也成为在地方社会中举办斋醮活动、凝聚信仰力量的道观和民祠。

结论

本文以碑石材料为主体，结合方志等文献对元明清东镇庙道士的整体情况进行讨论，并以东镇庙历代修造工作为中心展示道教等“非官方力量”之于维系和丰富东镇及其社会功能的意义。在讨论中，可以看到作为国家祠庙的东镇庙，在全真教道士打理下，与地方民间社会和信仰世界产生出复杂纠葛。

沂山东镇庙从元到清的变迁脉络中，可以发现多种“对立关系”交织互动：“国家祭祀

2011年版，第120-121页。

¹⁴³ 匪患是影响当地生活的重要问题，前注所揭临朐县五井镇同治十三年（1874年）所立《重修三元庙记碑》即记载：“咸丰末，南匪扰二东，淄贼附起，村民依山寨以图存，所遗居宅半劫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96页）。

¹⁴⁴ 有关民国年间临朐道士情况的负面评价，见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1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538页。

¹⁴⁵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1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532页。

¹⁴⁶ 李焕章：《民国二十九年重修寝殿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129-131页。

-道教打理”、“官方背景-民间运作”、“礼制规定-地方权宜”……一座东镇庙，因为不同人群抱着不同目的的关照、运作和参与，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由于东镇庙中来来往往的人群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导致以上“对立关系”呈现出权衡、协调和共融的特征，而非泾渭分明的零和对立。以东镇庙中各类修造事宜为例，尽管围绕神像的存废等具体问题有可能产生不同话语和权力体系间的争执和角力，但更多时候官方、道教、民间社会等势力之间仍能达成合作，戮力同心，继而各取所需。在关系交错的互动中，守庙道士扮演着串联者的角色。这些守庙道士显然不是任朝廷摆布的玩偶，他们不仅拥有专门属于道士的信仰生活和社会关系网络（宗派、法脉），更通过积极行动，成为东镇庙日常运作的实际执行人。东镇庙道士的绝大多数活动都已遭淹没，没有得到应有的记述，但仅就东镇庙历代修造工程而言，也可看出他们在串联道教、官方和民间力量时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东镇庙道教的案例为思考中国古代国家祠庙地方运作等问题提供一些启发。最初由朝廷设置于地方的国家祠庙，最终只能凭借地方力量的支持才能维系活力。而包括道教、民众等在内的地方力量，并不会全盘接受“儒家意识形态”下设定的祠庙制度和意义诠释，而是尝试在参与祠庙活动的同时掺入其他观念和实践——尤其是在官方无力维系祠庙正常运作从而放松对庙宇的把控时，从而使祠庙的意义和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最终，名义上的“国家祠庙”，在现实中成为多种文化共同展演、共生共融，且互相角逐的舞台。制度的编制有其初衷，但制度的执行却往往是权衡的结果。

附表 1：现存元明清东镇庙碑刻中的道士名录

说明：

- 1、下表格依《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和《沂山石刻》整理。为节约篇幅，若无特殊情况，出处仅给出较便参考的一个。
- 2、道士职位一并给出。
- 3、碑铭性质包括：遣官祭祀、修造、诗文、墓碑、民间醮祭。

时间	碑铭	性质	道士题名	出处
元至大四年 (1311 年)	《临朐县达鲁花赤祭 春记》	遣官祭祀	时道信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4
元皇庆二年 (1313 年)	《脱欢、蔡文渊昭告 碑》	遣官祭祀	宣授圆明真静纯德大师东镇提点梅道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6
元延佑六年 (1319 年)	残碑	遣官祭祀	圆明真静纯（下残） 按：残缺文字当为“纯德大师东镇提点梅道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7；《沂山石刻》， 页 272
元 ¹⁴⁷	《伽八徵残碑》	遣官祭祀	宣道和，执事彭腾霄，执事王士能，提举侯玄信，提领张德□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¹⁴⁷ 此碑残损严重，系年不详。《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编者称碑铭中“候玄信”出现于《神佑宫记》，推此碑为元碑。然经查《神佑宫记》中无“候玄信”题名（仅有“□玄信”），但此碑确为元碑无疑，碑文中宣道和出现于《神佑宫记》可以为证。此外，题名之“提领张德□”疑为张德显，而《神佑

				卷》，页 11；《沂山石刻》， 页 340
元至治二年 (1322 年)	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 庙神佑宫记	修造	<p>碑阳： 崇真明道大师本宫上院太虚延寿宫玄坛提举酈道顺，两经宣授圆明真静纯德大师本路都道录东镇太虚宫提点梅道隐，东镇沂山神佑宫提点知东镇庙事张德显，中玄妙义大师太虚宫提点唐志迁，安和明德通妙大师东镇庙神佑宫提点王道融</p> <p>碑阴： 弘教大师姜君，明□大师益都路道录两宫提点周（士）真人，渊静洞虚大师益都路道门提点王志朴，玄门大师武君，洞虚大师本宫提点曹志明，明道大师提点道全□□大师□□□道隐，阔然明素大师本宫提点杜道方，渊贞明静大师本宫提点张道珪，玄通大师□□□□路道录张道亨，□□□□□□□□□道隐，□□大师前□□□□□□□□，中玄妙义大师本宫提点唐志迁，明贞大师知东镇庙事本宫□张□，□明大师般阳路道录王□□，□□统德大师提举魏道真，东镇知观刘道源，本宫副宫赵道义、田福堂、□□□□□□道□、林庆童、□道隐宫□□□□□□王道融，本宫知观□玄信，通□然素大师益都路道提点兼本宫提点□□范和童，明达大师本宫知宫宣道和、韩德童，北磨知观洪德广、张云童，本宫副宫孙道信，本庙知观李道成</p> <p>* 碑阴题记有残泐现象，道士名单及职务不完整。</p>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8-10；《沂山石刻》， 页 30-34。
明洪武二年	《敕祀东镇庙记》	遣官祭祀	太虚宫守庙道士王德祚，邹德明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宫记》所载张德显已任“提点”，较提举品阶更高。故推此残碑时代早于元至治二年。

(1369年)				卷》，页 15
明洪武十年 (1377年)	《陆亨、王守静、丰继宗代祀碑》	遣官祭祀	道士王守静，丰继宗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20
明永乐四年 (1406年)	《吴宗显等致祭碑》	遣官祭祀	道士吴宗显，道会司□□□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21
明正统元年 (1436年)	《车逊致祭残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士王道延，守庙道士李寿真、李元真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24；《沂山石刻》，页 287-288
明正统二年 (1437年)	《任荣祭告残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士蒋□深，守庙道士李寿真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25
明景泰四年 (1453年)	《戚澜代祀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会刘得芳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28
明天顺元年 (1457年?)	《天顺年间残碑》	遣官祭祀	道士姜志先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28；《沂山石刻》，页 295
明成化元年 (1465年)	《李木代祀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会刘得芳， ¹⁴⁸ 神佑宫住持崔守诚，道士赵志安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31；《沂山石刻》，页 68
明成化三年	《临胸县重修东镇庙	修造	碑阴：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

¹⁴⁸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做“鞠得芳”。考虑到《戚澜代祀碑》道会司道会为“刘德芳”，疑《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录文有误，此暂依《沂山石刻》录名。

(1467 年)	记碑》		守庙道士李原真，本庙住持王志琮，道士赵志安、赵志雄、姜志海，化缘道士李喜延	卷》，页 35
明成化六年 (1470 年)	《李希安代祀碑》	遣官祭祀	本庙住持崔守口（诚？）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37
明成化十三年 (1477 年)	《陈俨代祀碑》	遣官祭祀	住持张永惠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43
明成化二十三年 (1487 年)	《黄景代祀碑》	遣官祭祀	住持道士孟喜升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47
明弘治七年 (1494 年)	《李兴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宋喜文，道士成喜通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55
明正德五年 (1510 年)	《乔宇代祀碑》	遣官祭祀	住持郭崇增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62
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年)	《沈应龙致祭碑》	遣官祭祀	本庙住持刘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76
明嘉靖四十年 (1561 年)	《重修东镇庙题名记》	修造	本庙住持/募缘住持唐教玉，道士陈崇进，助缘杜教用，郇一林，王教洪，李教允、孟道胜、申道贵，住持崔崇祐	《山东道教碑刻·临胸卷》，页 79
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鲍象贤致祭碑》	遣官祭祀	本庙住持唐教玉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卷》，页 81

年)				
明隆庆三年 (1569年)	《张体乾颂东镇诗 碑》	诗文	本庙住持崔崇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4
明万历十四 年 (1586 年)	《唐教玉墓碑》	墓碑	天师门下拜授上清三洞五雷经篆兼三五都功太平辅化仙卿唐以明 (唐教玉); 徒子: 薛道之、申道贵、孟道胜、吕道胸、姚道江; 俗徒子: 侯道夫; 徒孙: 方守田、申守政、付守智、杜守仁、杨守仁、徐守衫、田守俸、 杨守口; 重孙: 牛悟性、于悟贤、于悟清 玄孙: 申玄机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5;《沂山石刻》， 页 182-83
明万历四十 二年 (1614 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记 碑》	修造	碑阳: 住持道士吕玄阳、张演随、宋全科 碑阴: 住持吕玄阳、张演随、宋全科; 本庙道士王道蓬、王道真、申玄机、张真绪、邵守清、徐守衫、杨悟 清、崔演器、杜惟宦、张守存、马全守、李教花、夏全钊、张悟全、 聂全傅、班演化、尹演儒、高真和、曹真惟、崔惟训、吕演文、孙真 宁、赵演爵、朱演贤、白全德、田惟臣、户演香、周守明、赵守身、 张守文、王颜冲、朱真先、王奉冲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8;《沂山石刻》， 页 186-190

明末清初 ¹⁴⁹	《龙典史残碑》	不详	本庙住持田惟臣	《沂山石刻》，页 343
清康熙二年 (1663 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 记》	修造	曹口惟，石冲月，石冲明，住持道人朱全周，督推道人赵守身、倪微 教、顾清然、段和典、李冲喜、苑静云、祖悟赞、马静读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 卷》，页 92；《沂山石刻》， 页 194-197
清康熙初年 前后	《仁寿乡盘羊社修醮 残碑》	民间醮祭	玄门弟子苑静云，领醮王本固、李希耐	《山东道教石刻集·临胸 卷》，页 132
清康熙十六 年 (1677 年)	《赵守身墓碑》	墓碑	赵守身 (道号仰沂) 徒子: 祖悟赞、孙悟界 徒孙: 马玄举、马玄口、李玄和 曾孙: 许微笈、周微篇、柴微篆、王微簪 玄孙: 程清芬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 卷》，页 95
清康熙二十 二年 (1684 年)	《渠丘泊里庄碑记》	民间醮祭	本庙住持李德仁，领醮弟子于得江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 胸卷》，页 96
清康熙二十 七年 (1688 年)	《李振裕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冯希魁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 卷》，页 98
清康熙四十 年 (1701	《重修东镇庙碑记》	修造	住持王正位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胸 卷》，页 101-102

¹⁴⁹ 此碑题名“本庙住持田惟臣”，此人出现在万历四十二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中，彼时仅为普通道士。《沂山石刻》以此为据推此碑为明末清初刻立。

年)				
清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重新东镇神像记碑》	修造	道人徐和风, 道人刘无祥, 书字道人王得口, 本庙住持……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 104; 《沂山石刻》, 页 326-328
清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瓦尔大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石希照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 110
清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孙柱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道人……	《沂山石刻》, 页 330
清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	《朱汝锸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道人刘祯祥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 112

表 2：沂山东镇庙历代修造表

说明：

- 1、隋至金正隆年间（1156—1161 年）修造事宜，碑记不存，但依彼时庙令制度规定，推测当无道士参与。
- 2、东镇庙石刻已获得较好整理，故出处部分，在核实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给出最新整理结果。为节约篇幅，出处仅给一个。
- 3、与相关修造存在关联之其他记述，以“附”的形式呈现。

朝代	编号	年份	碑名/篇题	修造内容/述及事务	发起者	道士参加	出处
隋	1	开皇十四年(594年)	《隋文帝诏东镇沂山志碑》	首建东镇祠	中央朝廷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唐	2	长安四年(704年)	《重修东镇沂山祠记》	长庆三年遣使修缮,具体修造内容不详	中央朝廷	×	唯碑目存,《光绪临朐县志》,卷 9 之下页 175
	3	天宝元年(742年)	《修东镇沂山记》	具体修造内容不详	不详	×	《光绪临朐县志》卷 9 之下页 176 * 称此碑元时尚在,盖明时被人磨作它碑
宋	4	建隆三年(962年)	《宋太祖诏重修东镇庙碑》(《创建东镇庙记》)	庙址整体搬迁并重建	中央朝廷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乾德二年	《沂山东镇庙落成	新庙建成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964年)	记》				
		乾德二年 (964年)	《东镇沂山界碑》	划定东镇庙田产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418
金	5	正隆四年 (1159年)	《东镇修瓦殿记》	不详	不详	×	现已不见,碑文不全,《山左金石志》卷19叶17b(14675a)
	附	大安三年 (1211年)	《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	规定东镇庙山场范围,赋予知观道士“收执”侵占山林者的权力	中央朝廷	√	《山左金石志》,卷20页41b(14712a),唯碑目存
元	6	至治二年 (1322年)	《东镇沂山元东安王庙神佑宫记》	修建东镇庙之附属道观神佑宫	道众(神佑宫、太虚宫)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8-10
明	7	洪武九年 (1376年)	《重修东镇庙记》	重修,残泐,具体修造内容不详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18-19
	8	成化三年 (1467年)	《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	正殿、东西序、神库、神厨、披兵房、宰牲房、门楼、香亭、公馆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34-35
	9	成华八年 (1472年)	《东镇沂山寝殿成记》	寝殿改正殿,别创寝殿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38-39
	附		《东镇娘娘神像残片》			不详	《沂山石刻》页350-351
	附			谈及成化二年、六年重修事,即8、9两碑所述事项			《昌国觥觥》,卷4页26

10	正德二年 (1507年)		不详	地方官府	不详	无碑文传下, 事见《东镇沂山志》卷1, 页124
11	正德十年 (1515年)	《重修东镇庙记》	整体修整, 范围包括龙亭、正庙、东西廊、寝庙、东西厢房、碑楼、碑亭、钟鼓楼、山门、披兵房、灵星门、祭器库、宰牲房、驿站、内外墙、东西坊	地方官府	不详(文存石亡, 不知题名中有否道士)	《东镇沂山志》, 卷4页142-143
12	嘉靖五年 (1526年)		不详	地方官府	不详	无碑文传世, 事见《东镇沂山志》, 卷1页124
13	嘉靖廿八年 (1549年)		建东镇庙小殿	地方官府	不详	《临朐编年录》, 页197
附			提及知县王家士建小殿三间		不详	《嘉靖临朐县志》, 卷2页13
14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1556年)		数位地方人事积极参与重修东镇庙	地方民众	不详	《嘉靖临朐县志》, 卷4页87
附	嘉靖三十五年	《镇神灭寇》; 《东镇灭寇记》	东镇神灵协助平叛赵慈匪乱			《昌国舢舨》, 卷8页57; 《东镇沂山志》, 卷4页143
附	嘉靖三十五年	《重修东镇庙缘簿引》	募捐修缮东镇庙			《沂山石刻》, 页368
15	嘉靖四十年 (1561年)	《重修庙记碑》/ 《重修东镇庙题名	寝殿、两廡、灵星门	道众(东镇庙)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78-79

		年)	记》				
	附	嘉靖四十年 (1561年)	《游沂山记》	记载守庙道士称东镇庙失修, 无巨木一事			《东镇沂山志》, 卷4 页144
	16	隆庆三年 (1569年)	《改建东镇庙寝殿落成祭告碑》/《重修东镇庙记》	原寝殿改为正殿, 又修寝殿一间	地方官府	×	《沂山石刻》, 页177-178
	17	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碑》	整体重修, 具体工程不详	地方官府	√	《沂山石刻》, 页186-190
清	18	康熙二年 (1663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碑记》	大殿、寝殿、配殿、龙亭、宰牲亭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91-92
	附	康熙二年 (1663年)	《重修东镇庙碑》	描述东镇庙破败景观, 协助募缘		×	《沂山石刻》, 页195
	19	康熙四十年 (1701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记》	整体重修, 具体工程不详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101-102
	附			提及康熙元年、康熙四十年知县重修庙事			《光绪临朐县志》, 卷5 页148
	20	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重新东镇神像碑记》	东镇沂山神像	地方民众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页103-104

	21	嘉庆五年 (1800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 诗记》	整体重修，具体工程不详	中央朝廷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18
	22	嘉庆十一 年 (1806 年)	《新建三元庙记 碑》	在“沂山东镇之西口”建三元庙	地方民众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20- 121
民 国	23	民国廿九 年 (1940 年)	《重修寝殿记》	寝殿	地方民政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29- 131
	附			记载民国时东镇庙废，时有土匪 聚集其中；指出当时临朐道教情 况糟糕			《临朐续志》，卷 15 页 532、页 538

附文：

“秘传”道教古籍《东镇述遗记札》初探

文献材料之于文史研究的崇高价值，是公理性的命题。绝大多数文史研究均需以文献为基础展开探讨，文献的缺失和不足常会使学术研究举步维艰，这一问题在道教研究领域显得尤其严峻。造成道教文献相对匮乏和零散的原因多种多样，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尚有不足仍是颇为明显的问题之一。有时一些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原因，也会给地方道教文献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带来不易解决的困难。东镇庙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是一部保存在个人手中、尚未整体公开的地方道教文献。

东镇庙位于今山东省临朐县沂山山麓，是中国古代国家岳镇海渎祭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象征着朝廷之于东部国土的天命统治权。根据前文所述，金代朝廷便将东镇庙交给道士打理。最晚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东镇庙神佑宫兴建开始，全真道士便已作为“守庙道士”入住并掌管这座国家祠庙的日常运作，一直到清末民国传承不辍。这里要讨论的《东镇述遗记札》的作者赵守身，就是明末清初东镇庙中的一位重要道士。有关赵守身的个人情况，目前并无充分材料记载其生平，但保存在东镇庙中的三块碑刻多少能揭示他的一些信息。

时间	碑铭	题名	出处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	碑阴： 本庙道士……赵守身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88； 《沂山石刻》，页186-190。
清康熙二年（1663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记》	督摧道人赵守身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92； 《沂山石刻》，页194-197。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	《赵守身墓碑》	赵守身（道号仰沂） 徒子：祖悟赞、孙悟界 徒孙：马玄举、马玄□、李玄和 曾孙：许微笈、周微篇、柴微篆、王微簪 玄孙：程清芬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95。

从这三方碑刻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赵守身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万历四十二年时，年仅十九岁的赵守身已成为东镇庙道士，此后在庙内地位稳步上升，至清康熙二年重修庙宇时担任工程的督摧一职。从上表赵守身墓碑上后辈

名来看，他在羽化前已传四代弟子，具有比较高的教内身份。

根据临朐文史工作者介绍，当地保存赵守身所撰《东镇述遗记札》一部。赵卫东考察得知，这部著作的一个本子曾为临朐县政协文史委委员吉星田先生保存，吉先生过世后本子为其家人收藏。赵卫东“想尽办法，但未能见到该书”，然临朐县博物馆副馆长宫德杰、临朐县政协文史委委员刘振宗表示曾亲眼见过这个本子，“说明该书确实存在”。¹⁵⁰记载东镇庙道教的传世材料不算太多，专门记述东镇情况的材料有《东镇沂山志》，¹⁵¹但其中有关道教情况的记载却较为破碎。其他元明清时期临朐、青州、山东方志、东镇庙现存碑石，对东镇道教的记载也缺少整体性。在这样的文献背景下，《东镇述遗记札》天然地拥有一定的学术补充价值。此书长期以来秘不示人，至今未在任何平台公开。然当地文史工作者在著作中多次引用该书，因此眼下可以通过“辑佚”的办法，整理出此书部分内容，并以这些内容为基础来管窥这部著作的特点及价值，由此或许可以勉强弥补无法得窥全本的遗憾。

一、《东镇述遗记札》“辑佚”

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既未公开，内容本当无人得知。但好在包括原持有者吉星田在内的当地文史工作人员多次引用书中文字，给予我们一窥此书内容的机会。本人选取最集中引用《东镇述遗记札》的三种论著，以“辑佚”的方式抽取源自赵守身著作的文字。这三种论著分别是：

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 年版。

潘心德主编：《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吉星田：《临朐县佛教、道教兴衰述略》，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临朐县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1 辑，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1993 年版，第 147-161 页。

三者之中，以吉星田的文章引用《东镇述遗记札》最为集中。如前文所述，吉星田正是这部著作此前的持有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三部著作并未完全遵守文献征引需一一出注的规范，致使在“辑佚”时需要进行一些判断取舍。具体而言，标准如下：

- 1、三部论著标以引号的原文征引，当出《东镇述遗记札》无疑，（引用）“性质”栏标以“原文”。但不同著作引用同一段文字时存在细微差异（通过对比，基本确定是细心与否造成的结果），此类情况在“说明”栏中点出；
- 2、宣称文字或内容出自《东镇述遗记札》，但并无引号标注，行文呈现代文风格，当为经作者理解后的转述，“性质”栏标以“承袭”；
- 3、部分内容没有交代文字和说法出处，但据本人考察目前并无其他材料记载其事，复结合对原作者参考文献范围的认识，推测这类记述大概率援引或总结自《东镇述遗

¹⁵⁰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 辑，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303 页。

¹⁵¹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

记札》，“性质”栏标以“疑似”；

- 4、三种当代论著使用简称表示，张书=《沂山石刻》、潘书=《东镇沂山》、吉文=《临朐县佛教、道教兴衰述略》。例如“张书 202”，即代表“《沂山石刻》第 202 页”。
- 5、一段文字中，原文与承袭、疑似并存者，以引号“ ”标注原文，以方括号【】标注承袭，大括号{}标注疑似。
- 6、标点偶有修订，不赘。

显然，这里的“辑佚”并不是呈现《东镇述遗记札》的最佳方式，但在这部秘传抄本公开前，本文或许依旧拥有暂时性的学术价值，使我们得以获得部分道教研究新材料，增进对这部著作及其作者赵守身的了解。

《东镇述遗记札》“辑佚”表

编号	内容	性质	出处	说明
1	“前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岁次丁卯，川人释子王静（净），由巫山来东海青州说法传经。先寓仰天，越年，南去东镇沂山，居极巅玉皇顶泰山祠，设坛传教，四方士商村老云集，拜佛习经，多至数百。”【佛徒日增，祠狭难容，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于沂山中心、圣水泉畔营造“法云寺”。东汉末，陕西羽士张丹诚，受天师教主张鲁委托来沂山朝阳洞设坛，宣说“五斗米道”，甚得民心，并于洞外建造“朝阳观”。东晋太和六年（371），法云寺住持竺法汰在前秦高僧道安建议下，又于山之东麓创建“明道寺”。其寺大僧众，香火极盛，为沂山佛寺之最。】《东镇述遗记札》载：“（明道）寺大竟数十亩，面临汶水，背靠凤凰岭，左毗官道，右倚镇山。寺钟山音回荡、香火云烟升腾。每逢朔望，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北魏孝文帝延兴初，沂山再增建白玉庵、柳泉寺、朝阳寺等五座兰若提招。】	原文 + 承袭	潘书 16	首段原文，又见吉文页 147-148，细节稍有不同。 中段承袭，类似文字又见吉文 148-149，吉文多出一句朝阳观描述：“因其主张顺乎民心，道徒日众，官府畏其聚众谋叛，遂于曹魏甘露间（公元 256-259），下令取缔，并拆毁朝阳观，填塞洞窟。” 末段明道寺原文，又见张书 9、吉文 149。
2	仰沂道士：安徽亳县人。	疑似	张书 202	此段赵守身郡望记载，不见其他文献材料，疑出《东镇述遗记札》。
3	《泊里醮记》有三，先者南宋嘉定十五年，祈攘兵戈之灾；次于元至正七年祷息地震；三者隆庆二年禳祛水患。	原文	张书 205	
4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下诏沂山立祠）【封山诏下，道家遂于法云寺侧创建“东镇沂山神庙”，	承袭 +	潘书 17	神秀明道寺传法事，又见潘

	佛门于沂山西麓天齐湾畔增建青龙寺。至唐，法门受宠得势，于太宗贞观十年（636年）诏封沂山为“东安公”后，这里逐步为其所占有。高宗龙朔间（661—663年），禅宗五世弘忍的弟子神秀来沂山说法，在其提示下，咸亨五年（674年），又在山外九龙口增建凤阳寺。周武氏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遣使修沂山寺院，并于明道寺北增修青竹庵。代宗大历间（766—779年），在沂山内外鑿凿佛石屋80余座，还于歪头崮、花枝台等10余处的悬崖峭壁，广雕摩崖造像，大小共2000余龕。】《东镇述遗记札》云：“（唐）文宗开成间，东泰景致，可谓古来极盛。百里雄山秀水、万顷丛林花木间，经营繁华棋布，古刹尼庵凡十有九，庙观凡五，台凡四，塔凡二，亭凡六，桥凡七，洞府凡六，佛石屋九十有九，它如崖壁佛龕，诸小营造，繁不胜数。其位巧涓，境幽相适，天工人作浑一，景美色丽。淄黄论道山亭，墨客优游桥溪……”。	原文		书99“九龙口”。推测此段内容中“承袭”者系总结《东镇述遗记札》不同篇章内容而成。
5	宋朝肇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年）“诏重建东镇庙”，遂由山阿圣水泉畔迁至山下九龙口凤阳寺遗址重建，由单室小型扩建为占地数十亩、庙舍170余间的大型山庙，其为沂山寺庙之首。山庙落成，宋太祖亲临祭告。太宗淳化中，于百丈崖建造“迎仙亭”。景德元年，创建明道寺舍利塔。明道、景佑间，创建歪头崮碧霞祠，修复南天门，对法难中被毁的古建，几乎无一修复。此时，沂山又成了道家的天地，由于古建毁圮，新建甚少，仅有春秋二季的东镇庙会，且游客有人疏落，景况萧条。 宋末金代建立，世宗完颜雍巡游沂山。宣宗时，设穆陵县，沂山归其管辖，并于迎谷山建造“雨师庙”。人们祷雨不再远去百丈崖，香火兴盛。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全真道大宗师丘处机登临歪头崮，来年，为纪念真人至沂山，于崮巅北侧建“长春亭”，名人光临，古建修……	承袭	潘书18	此段文字所述之法难，见潘书136。
6	法云寺北里许，峻陵拦截，其阴之腰有穷窟，口呈半月状，高二尺许，低首可进。口内盘石若席，左右空旷，晦暗不明，约可容人数十。徐步前行丈余，洞渐缩窄而斜下，漆黑幽深，静听惟闻滴水声。秉烛借明而入，两边大石齟齬，脚底确牵滑踏，扶石蹶足十数步，霍地寒气袭骨，冷风熄烛，阴森惊人，怵然不可进。	原文	潘书34	描写黑风口。

7	花枝台下，山径内侧石壁，题刻数处，皆大家名笔。其中有唐至德间庆州节度使邓景山题壁“香溢九天，红耀四海”；有宋翰林学士曾布题刻：“神台仙花”；有明工部右侍郎黄福刻石“天女散蕤英，神台凝彩霞”。	承袭	潘书 40	
8	东泰有异光，色若银，状若环，周浹千里。盛世则出，月在无射，时在隅中，非德者慧目不可见。	原文	潘书 50	
9	“放光石成于古帝，神妙叵测，曩时至宵生光，而今，石尚存，光沉失。或曰惟晦日闪烁。” 【石之背阴两侧有题刻，背镌“放光石”三大字，因岁月久远，曝寒风化，刻石剥落，大字尚依稀可见，而款识圯坏难以辨认。案《古骈邑》云：“其阴为北魏献文帝思皇后父李惠题石，书体行兼草，直排，字径近尺，雕镌双勾，气势豪放逸致，笔意古拙老练。”西侧题“神烛耀天地，灵光分阴阳”，为北宋景佑间京东安抚使、知青州龚鼎臣撰书，体行楷，字大盘口。东侧镌“混沌之光”，草书阴刻，左下钁田琢题。左右题刻，俱漫漶难别，唯“混沌之光”拓页存于庙。】	原文 + 承袭	潘书 83	放光石上题字及拓片存东镇庙事，当出《东镇述遗记札》。《古骈邑》文字来源待考。
10	洞门题联，书体行草。“腾空”两字，草书，气势豪放，笔意遒劲老练，大若斗，阴刻。左上侧有宋人北海主簿王子兴题句：“腾空四飞天下安，吕祖一书古今名”。其阴尚有五绝一章，漶蔽难辨，传为元人书。	原文	潘书 91	描写吕祖洞。
11	山阴有砚池，半月形，色玄，面大三分，其深叵测，岁旱，汶水流断而不涸。池左有“洗笔石”，状若莲叶，中凹陷似钵，径大五尺，深二尺许。年多贮水，亢阳则渴，天欲雨，则出津如汗。人称“荷叶洗”，或曰“报雨石”。其顶端南侧有铭文，除款识残存“端拱”二字依稀可识外，余尽漶化难辨。由此二字可信传为宋人题刻勿疑。石尚存，然龟裂数块，水不复存矣。石南崖上有古木，大数围，高三丈许，枝短为劲，不花不果，春发叶，细卷入侯桃之蕾，放则殷红，望之似花，乡人呼为“笔管树”。传于宋末枯朽，无续藁。	原文	潘书 96- 97	描写笔架山。
12	东岱震麓九山，奇状各具，怪石灵异，自左而右，于龙九子由长而少之形象、性情与嗜癖，	原文	潘书 99	描写九龙口。

	极为相似。如长子鬲辰，好负重；次子螭吻，喜张望；三子蒲牢，爱怒吼；四子狻猊，性威严；五子饕餮，贪饮食；六子虺蜺，喜游水；七子睚眦，格斗好杀；八子狻猊，嗜欲烟火；少子椒图，性偏闭守。【山龙彼此形似，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征，故名九龙山。】前三山，亦谓凤凰岭，为周穆天子姬满所封。曩昔，岭下有古冢，传为唐左骁卫大将军褒国公之墓，今圯毁无迹。大唐高宗龙朔间，禅宗五祖弘忍弟子神秀，由玉泉寺至东镇明道寺传授禅法，遍游沂山至此，见九岭聚结山口汶水，气势非凡，曰：“九龙会于斯，钟灵必毓秀，圣地也”。遂名“九龙口”。	(?)		此段文字原书将之放在同一个引号内，但“山龙彼此形似”一句不太可能出自《东镇述遗记札》。
13	东镇沂山佛石屋殊多，总计九十有九，偏远而小者水石屋，于奥隅天齐湾北山之麓，距山庙约【30公里】。	原文 (?)	潘书 105	此段文字原书将之放在同一个引号内，但“30公里”之词不太可能出自《东镇述遗记札》。
14	(宋代《创建东镇庙记》)此庙改址新修，总造庙殿楼阁、道舍斋房九十三楹，历时两年又八月告竣，改称“东镇庙。”庙田山场“东至义道约二里，西至黄泥户洞约三里，南至长城约二里，北至凤凰岭流水分界处。”	疑似	潘书 111	宋代《创建东镇庙记》原石亡佚，碑文亦不见收入其他文献，疑为《东镇述遗记札》所录。 此段文字庙田四至与现存东镇庙之《神佑宫记》一致，但里数不同。
15	自唐尧至清初，有历代古树 5 种，40 余株。	承袭	潘书 115	描述东镇庙古树。
16	山庙正殿南，左有钟楼，右侧鼓楼，经营粗俗，简陋不宏。元延佑中，移址新建，形制楼阁式。	原文	潘书 127	
17	晋、宋刻石，仅见残石片字。唐宋五碑，倾倒残断，字亦湮脱，难辨其意。立者五石，早为金	原文	潘书 133	描述穆陵关石刻。

	天德四年《重修穆陵关记》，再为元至正十二年创建戍楼碑，其他皆明碑，一为礼部右侍郎薛瑄诗刻，余二为修葺戍楼刻石。			相同文字又见张书 397。
18	敕出国都，电驰雷急，八月下浣，州、县令乡民荡平明道，拆毁朝阳、凤阳、柳泉、光恩四寺及白玉、青竹二庵。捣毁铜、铁、石、木、陶、泥造像 700 余躯，断肢残首，遍仍山野。还俗僧尼 130 余人。	原文	潘书 136	记述会昌法难对沂山佛教的影响。 阿拉伯数字当为作者所改。
19	东镇寺庙祠观，多供石造像。古刹明道寺，佛四百，俱石躯，巨尊八尺许，低不足尺。镌刻工致，情态活脱。	原文	潘书 141	
20	唐末武宗李炎会昌五年，敕令毁天下佛寺，沂山寺庙拆毁几尽，但青竹庵损坏极微。相传拆寺群黎捣毁明道寺后，执镐持锤，蜂拥直向青竹庵。刚至清泉谷口，突然浓雾弥漫，昏暗不辨东西，旋即乌云密布，闪电雷鸣，大雨倾盆，溪流山洪暴涨，道滑水阻难行，人疑佛祖显灵护佑，毁则不吉，众莫敢进。是庵，仅自毁两庑塑像，封门停止祭祀，暂得保留。时过百年，至五代后周显德间，世宗柴荣诏令废天下佛寺。此次法难，青竹庵再难幸免，殿宇佛像悉为拆除捣毁，变为废墟。北宋初，乡民募金醮资，于此再修菩萨庙，小型单室，全石砌筑。香火冷清，不数十年，失修倒塌，自此不复再建。	承袭	潘书 146	
21	亭凡一间，形长方，四壁皆石为之，砌工颇粗，顶覆瓦垄。离坎月牖，震兑券门。震门楣上有匾额，镌刻“迎仙亭”三大字，末刻“封丘赵贺书”。	原文	潘书 150	描写迎仙亭。
22	发云再造，时竟岁又半，营修殿庑凡二、亭楼凡三、佛堂一、僧舍凡四、杂房弗陈，统合为二十余楹。前庭后院，局促而井然。	原文	潘书 152	描写发云寺（后改名法云寺）。
23	法云寺大佛殿右，松林山岩间，有庐舍，名“草楼”，为法云寺二代住持法规禅师先年之居。永和间于旧基再造，更名“飞云”。其凡三楹三级，制式巧计，木瓦精良。五代中，乔士于壁绘佛，灵化真体，奇闻天下。元重建，革制式，改为二级。今圯，惟见础石散落树下林间，可实之。	原文	潘书 156	描写发云寺飞云楼。

24	山外嘉宾至寺，住持常命僧徒林内拣柴，泉中汲水，煮茶会客于此。	原文	潘书 161	描写明道寺公喜亭。
25	天台亭，于唐中世开元间复修，并更名“瀛洲亭”。至北宋太平兴国中，再次重修，形制改为六角式，瓦木结构，且复其原称“天台亭”。南宋末战乱频年，管理不善，渐再损坏，咸淳初，遭雷霆之灾摧毁。元、明无修，遗迹亦随日月的推移而消失，仅存其名。	承袭	潘书 169	
26	佛石屋之外，尚于山中峭壁悬崖间，凿雕龛室佛像，十有三处，佛数百躯。其中歪头嵌石壁者，神态多变，繁而佳。	原文	潘书 172	
27	顶端有石阁，相传创于唐，上嵌石铭额曰“南天门”，胸邑令李道宾笔，今俱废无迹，存者乃明成化重修，门型戍楼，券弓上题额为青州知府李昂书。	原文	潘书 176	描写十八盘。
28	“亭外间北壁，嵌诗刻一方，为丘真人赋书。明季亭圯，毁盗不明。此无记，仅由传说可知，诗体七律，前有序，为颂东泰而赋。以咨访喜获‘蜃景万千览未了，东镇时游梦寐间’末二句。惜哉高咏不全。粗记数语，以俟好古者考焉。”{亭外左侧碑二幢，一为创修长春亭碑记，一为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题书的“春光常在”碑刻。字径 10 厘米，体行书，笔意老练，遒美劲健。镌刻形式双钩。相传亭前右侧巨石上尚有孔克绍题刻“春惠人间”。}	原文 + 疑似	潘书 182	描写长春亭。 疑似部分不见其他文献，且亭外碑于清初已毁，故推测总结自《东镇述遗记札》。
29	洞门上镌石匾额“罗汉石屋”，为后魏高僧法真手笔，旁排正书。屋内有罗汉佛造像，立式，圆雕，高二尺半许，料以青石。案石壁铭刻记载：造像于后魏延兴间，正中弥勒佛，其左右八分两列，每列八尊，计十六罗汉造像，各有佛号尊名，自内而外，左列第一尊曰宾头卢尊者；第二曰迦若迦伐蹉尊者；第三迦诺迦跋厘惰阁尊者；第四苏频陀尊者；第五诺矩尊者；第六跋陀罗尊者；第七迦里迦尊者；第八伐阇罗弗多罗尊者。右列第一尊曰戎博迦尊者；第二曰半托迦尊者，又称大路边生；第三罗睺罗尊者，号称密行第一；第四那迦犀那尊者；第五因揭陀尊者；第六伐那婆斯尊者；第七阿氏那尊者；第八注荼半陀迦尊者，又称小路边生。北周建德初击毁数尊，唐大历间，再造补全，且增添二尊，分别曰摩诃迦叶、三藏法师。至此，十八罗汉具矣。	原文	潘书 184	描述罗汉石屋。

30	三国曹魏东莞太守胡质挥毫赞美曰：“殿内洞天众仙会，门外圣地群山环。”曹魏末，“道流众达数万计，广涉胸邑、东莞、缘陵、安丘、蒙阴十三县。”	疑似	潘书 186-187	描写朝阳观。 此段文字不见其他文献，原书亦未给出出处，按照潘书特点，疑出《东镇述遗记札》。
31	淳化中，于旧地拓址再造，殿祠原制，道舍改营，增建左右两庑，随垣闾阖更为山门，楣上嵌石额，为隐逸傅霖题，正书，笔力劲练。大殿将军造像黑金，颇大，为邑内独尊。	原文	潘书 189	描写常将军庙。
32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泰山祠，数年后徙仰天。所传道义，主要是《道德经》，教少讲炼丹之术。在士民中影响很大。相传在他去世三百多年后的北魏时期，每逢忌日，尚有人祭悼。】	承袭	吉文 148	“教少”，显为“较少”之讹。
33	“天师莅东镇，设坛朝阳寺，听其讲道诵章，习其仙术者，下自黔首商贾，上至士子官衙，拜谒盈门，肩摩踵接。”【到东魏末年，全县有道士 150 余人，道徒近万人，建庙观十余座，其中较大者县城有紫云观，乡间有长春观、尧山庙、灵山庙等。】	原文 + 承袭	吉文 151	记述寇谦之到东镇传道。
34	【在大业年间，曾受炀帝敬佩的道士王远知，至临胸紫云观、沂山明道寺传道，主张“道、释、儒三教合流；薄名利，教政相辅；轻炼丹，重医方延寿疗疾。”】	疑似	吉文 151-152	整段文字不见其他文献，似为作者总结《东镇述遗记札》而来，其中引号内文字怀疑为原文。
35	【据史料载：骈邑僧众二千三百有奇，寺庵据地百又六十余顷，皆沃土肥园，本是百姓垦植田亩，强行夺占。朝廷宠释，沙门仗势横行，迩来灰圈农田，戏狎村妇，邪恶日甚。相传文宗大和间，沂山明道寺住持善法，择容仪艳丽信女为婢，于身边服侍朝夕。由上述可知，在唐代中后期，有些佛门僧徒，借官府势力，横行城乡，无恶不作。同时，佛家还四处寻衅，无事生非，排挤道教，】“文宗开成之元（公元 836 年），岁次丙辰三月，明道寺住持善法，令僧徒百众，突冲太山祠，尽抢资财，焚毁道场，羽流强驱山外”《东镇述遗记札·佛教补阙》。”	承袭 + 原文	吉文 152-153	

36	{唐初，精于医学的远知弟子刘玄通，施医乡间，四处游说倡导，统一了各派思想，严整组织，并努力倡导与佛、儒两教合流。……道主通玄住紫云观，设坛场，传医方，极受士民尊崇。高宗显庆间，胸大疫，道请北海道人李清，巡医胸邑城乡，通游营邱、安丘、沂水等县，授方施药，痊活人万余，颂声载道，威望日高，发展较快。道士增至 300 多人，重修了太山祠，还新建庙观三所，县城有清玄观，乡间有牛山庙、嵩山庙。至天宝末，道主规德与儒家往来频繁，引起沙门嫉恨，处处受佛家排挤。}	疑似	吉文 153	作者未给出出处，但内容不见其他文献，且符合全真道士口吻，疑从《东镇述遗记札》总结而来。 “道请”似当为“道主请”。
37	【敕出国都，电驰雷急，八月下浣，州、县令乡民荡平明道，拆毁朝阳、凤阳、柳泉、光恩四寺及白玉、青竹二庵。捣毁铜、铁、石、木、陶、泥造像 700 余躯，断肢残首，道仍荒滩山野。还俗僧尼 130 余人，仅留法云寺，令老病无归的僧徒看守。九月上浣，胸邑拆庙怒潮波及会境，月尾渐平。共拆除僧尼庵 110 所，幻速僧尼 2100 多人，收回良田 150 余顷。所保留的十数处寺庵，俱规模较小，殿堂斋舍简陋，僧尼也尽是老弱病残。】	承袭	吉文 154	“会境”，当为“全境”之讹。
38	【相传唐末干符间（公元 874—879 年），河间府道人吕洞宾传道至东镇，】“倡导指点：‘同佛儒合流，勿计释门前仇，少土木之工，重济苦于民，行正人尊，道自成矣’”《东镇述遗记札》。	承袭 + 原文	吉文 154	
39	【据有关资料考证，自唐末至五代后期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 925 年），全县有道士 400 余人，道徒 18000 人，道院增修了法云寺西飞云楼、双山庙、七宝山寿元庙等。】	承袭	吉文 155	有关道士数目，不见其他文献。据本文其他“辑佚”结果，可知《东镇述遗记札》中确实给出历代道士人数，故推测承自此书。
40	“仁宗庆历间，邑内道众七百余，各居丛林”。（《东镇述遗记札》丛林二）	原文	吉文 156	
41	【临胸道士沈清（河北雄州人）亲赴宁海拜师授业，归胸后，对羽士道徒的离心邪念，道行了“回心自省”，使思想统一于会真道。调整了庙主设施，除却县城道场，只留东镇庙一处。经过整顿，教规严明，“真行”突出，增强了三教团结，取得了社会百家支持，使临胸道教日	承袭 + 原文	吉文 156-157	“道行”，当为“进行”之讹。 “会真道”，当为“全真道”之讹。

	趋昌盛。 十数年后，王重阳的徒弟长春真人丘处机至东镇传道，当时听其讲道的盛况《东镇述遗记札》载云：【“坛设镇庙，虔心拜教者，三教弟子、士类庶民，远来莒沂，日达千众。真人宵授于殿堂，昼徒祭台露天，七曜不息”。			
42	【至元代后期，极盛时羽士达 1070 人，归附弟子 2 万余人。道院也增添不少，如澄心观、济世观、至明观等，都是此时新修的。】	承袭	吉文 157	原因同吉文 155、156 等。
43	【佛教在金代虽有所发展，但远不及道家。至元朝，青州辨和尚传教来胸，遍游境内寺庵，宣说佛法，强调】“法于心诚，诚见善行，行度众生，生赖佛法”，【要求僧尼善行为本，济世为责。由于他的思想主张较合民心，皈依颇多，使临胸的佛教振兴一时。至元末，僧尼人数与寺院建筑都有较大增加。】	疑似	吉文 157	原书未给出出处，类《东镇述遗记札》“佛教补阙”内容。
44	【县内道徒日众，道院也屡有增修，道观多达 83 所，道士 1400 余人。临胸道教至成化初，达到极盛。自金大定中期后的三百年间，唯一信奉全真道。至成化中，部分道士违禁“三戒”，习学符录，信仰“正一道”，逐渐分裂为两派。自此，临胸道教也由极盛而遽衰。】	疑似	吉文 157-158	原因同吉文 155、156 等。
45	【佛教在明洪武间，兴腾一时，僧侣增加，并于二十三年（公元 1390 年），在县城新建万寿寺，且重修了演德寺等十余座寺庙。这时，佛门以为皇帝宠信，骄纵滋生，至正统间，鸿门寺和尚横行欺人，乡民火烧寺院，官衙严惩僧侣首恶。自此，佛教官恶民恨，急趋衰止。】	疑似	吉文 158	原因同吉文 157。
46	【据《东镇述遗记札》载：康熙初，道人众至八百，庙殿新置景阳真武祠、沂山关帝庙、盘龙山碧霞官等十一处。】	疑似	吉文 158	原因同 155、156 等。

*潘书中尚存来源不明之叙述，怀疑与《东镇述遗记札》脱不开关系，如潘书 113 称东镇庙“有羽士百余人”。但这些内容原书未给出出处，亦难推定确属《东镇述遗记札》，只得暂时割舍，不列入上表。

赵卫东怀疑《东镇沂山》书中的《东镇庙碑目》有可能也出自《东镇述遗记札》，但此说尚不确定，暂未列入上表。赵卫东观点，见其《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 辑，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303 页。

二、《东镇述遗记札》“佚文”所反映的此书特点

从以上“辑佚”所得，多少可以总结出《东镇述遗记札》的一些特点。

- 1、书籍规模。根据三部当代论著的引用方式来看，此书规模应当不会太大。引用时不见标卷，推测赵守身这部著作有可能不分卷或唯有一卷。
- 2、据《东镇述遗记札》中出现《佛教补阙》《丛林二》这样的小标题，可知此书内部分多个专题，相关内容被划入相应篇章。“丛林”部分可能着重记述道观庙宇的历史沿革，“佛教补阙”则描述沂山佛教兴衰相关事件。
- 3、从文字内容组成来看，书中当包括沂山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沂山道教、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甚至给出历朝历代沂山地区“僧道人数”）。书中对沂山部分已佚碑铭的记述，具有一定价值。如三种已佚《泊里庄醮记》的时代和设醮因由，使我们获悉宋元时代开始，地方社会便有可能在国家祠祀东镇庙中自行开展非官方祭祀活动；宋代《创建东镇庙记》则使我们获悉东镇庙搬迁至沂山山麓时，最初的规模和建置等。
- 4、内容真假。从目前的辑佚结果来看，《东镇述遗记札》给出的记述，既不是全然的虚构，但也并不都是确凿的记载。如书中描述发云寺、迎仙亭、穆陵关石刻、佛石屋等内容，基本可以坐实，问题不大。但书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却带有“道听途说”的特点，如张丹诚受天师张鲁委派来沂山传道并建立朝阳观事，可能性不大；寇谦之在沂山设朝阳寺的说法也不见来源。《东镇述遗记札》给出的历代沂山地区僧、道人数，恐怕除明末清初的数字外亦多不符实。
- 5、撰述立场。身为全真道士的赵守身在撰写《东镇述遗记札》时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宗派立场。书中部分文字表达了对沂山佛教的不满，也表达了对同属道教的“正一道”的排斥。如第45则，称明代鸿门寺僧人横行乡里，为民所恶，导致沂山佛教渐衰；第44则认为金代以后沂山地区道教以全真为正宗，成化中部分道士违反“三戒”，学习符箓，信仰“正一道”，导致当地道教转衰。而赵守身记述的全真道历史，却未发现任何负面讯息。

基于对目前收集的《东镇述遗记札》文字的观察，可以发现这部著作对沂山和临朐的道教和佛教研究确实有一定意义，书中对已经亡佚的碑铭材料的转录，使我们有发现更古材料的可能；同时，这部著作对理解赵守身本人及明末清初沂山全真道的生活环境和整体情况，也有一定帮助。从表格中的文字来看，赵守身描绘出一幅释、道（包括全真、正一）并存的沂山宗教图景，其间官方力量也并未缺席，而是担任着调整沂山宗教比例和密度的裁判者身份，时时通过政治命令等方式介入沂山宗教管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镇述遗记札》中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说的呈现，也不缺少“史料价值”。这类记述虽不能作为揭示历史事实的原料对待，但却可视作揭秘明末清初沂山当地道士所建构的地方道教史的结果来进行考察，从中可分析出以赵守身为代表的当地道士如何取择传说和史事来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历史，并凭借对历史的构拟来建立自身的正当性和崇高地位。

代结论

——对坊间道教文献整理工作的呼吁与期待

根据上述讨论来看,《东镇述遗记札》对当前的地方道教研究确有一定意义,是展现东镇宗教历史比较重要的文献材料。遗憾的是,此书传本非常罕见,唯一明确知悉所在的本子尚未获得公开,不免令人有些遗憾。这部著作传本的形式(抄本/刻本)、保存状态(完整/残缺)、制作时代(古/今)、流传过程,甚至是真是伪等,目前均无法给出有效判定,更具体的史料价值以及“文物价值”需等待此书公开(至少书影公示)后才能判断。

通过近几十年各地学者的辛勤工作,大量地方文献得到重新发现,包括道教研究在内的地方文史学研究被持续地注入活力。然而,仍有不少罕见的地方材料有待搜集、整理和公布。书籍材料当然可以保存在官方或私人等任何良好环境中,但一个“本子”价值的开发和判断,却建立在对这个本子的研究基础之上——概不示人的“秘籍”因学术和古籍信息不清,很难真正获得各界重视。水火无情,若“秘籍”不慎毁坏,不免又背上愧对先贤的恶名。要知道,物品虽属私人,但先贤的著述和智慧知见,却是天下公器。对于罕见文献的持有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而言,双方之间并非是“博弈关系”,文献的公开和学者的研究不仅不会致使某个本子丧失价值,反而会成为明确展示本子价值的依据。

期待各种罕见文献的持有者高风亮节,早日公开所藏文献,为促进家乡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当《东镇述遗记札》得以完整公布时,这篇短文也将失去任何学术价值——期待看到这篇文章被扔进垃圾箱的一天。

本文正文英文和中文版, 分别发表于:

白照杰:《道教与元明清东镇庙的管理和运作——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3期,第127-133页。

Bai Zhaojie and Yao Teng, “Daoism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Eastern Stronghold Temple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Religions* 13 (2022), pp. 1-15.

链接: <https://www.mdpi.com/2077-1444/13/2/159>

此次收入文集,经过大幅扩展及修订。

本文附文发表于:

白照杰:《“秘传”道教古籍〈东镇述遗记札〉蠡测》,《弘道》2022年第1期,第52-65页。

白照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

电话: 13788986040

邮箱: bai_longfeng1@163.com